

2017 第 1 期（总第 47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丛京生教授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4
稳中求进，立德树人——北京大学 2017 年领导班子寒假战略研讨会 召开	5
北大师生纪念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 100 周年	7
北大继续教育学院召开领导班子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	9
北大继续教育学院与校内专业院系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1
厉以宁教授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13
北大校友屠呦呦荣获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5
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度通识教育教学研讨会	15
校领导出席“网络新青年”培养与思政教育创新座谈会	17
民盟北大委员会走访 96 岁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20

■ 网教之声

“慕课”的六大发展趋势	22
汤敏：慕课对传统教育有何冲击	25

■ 北大人物

邵子剑：支教边疆，是生命中最受用的大学	31
杨柳教授：患者眼中的光明使者	35

■ 学者谈读书

汤一介：我最喜爱的书-----42

刘小枫：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45

■ 好文共赏

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一个人的百年史-----48

■ 史苑钩沉

李零：历史就在你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54

■ 大美北大

燕园春雪-----74

■ 学员心声

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75

编辑寄语

新学期,燕园网讯又和大家见面了!

2017年的年初,继续教育学院在年度总结交流会上和校内11个院系签署了院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期能够发挥专业院系师资课程及教学优势,结合继续教育学院的市场开发和管理服务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北京大学通过继续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继续教育学院和校内各院系合作的全面展开,必将开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各位老师、同学在寒假过后又回到了各自工作、学习的岗位上。祝愿大家新学期顺利,工作顺利、学业进步!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从京生教授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美国当地时间 2017 年 2 月 8 日，美国国家工程院宣布了新当选的 84 位院士和 22 位外籍院士名单。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客座教授、高效计算与应用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研究所共同主任从京生因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综合算法的创新在专用可编程逻辑领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fo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application-specific programmable logic via innovations in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synthesis），从而榜上有名。

从京生 1985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1987 年和 1990 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分获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现任校长讲席教授、特定域计算中心（Center for Domain-Specific

Computing, CDSC）主任、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实验室（VLSI Architecture, Synthesis,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 VAST）主任。他所发明的 FPGA 综合算法成为目前世界上通信和计算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电子设计自动化和高能效计算与应用领域发表 400 余篇论文，曾获美国计算机学会（ACM）、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联合颁发的 ACM/IEEE A. Richard Newton 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成就奖，IEEE 电路与系统分会、计算机分会年度技术成就奖，10 个最佳论文奖和 3 个十年最具影响力论文奖等诸多奖项；与此同时，指导了 36 名博士研究生。2010 年 12 月，从京生创建了北京大学高效计算与应用中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心从无到有，稳步前进，在高效计算与应用及其相关领域多个顶级国际会议为学校实现了第一作者论文零的突破，提升了北京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作为美国国会所批准的三大国家学术院之一，美国国家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旨在为国家提供工程科学和技术领导服务。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科学和技术界“为工程研究、实践或教育

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业荣誉之一。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稳中求进，立德树人——北京大学2017年领导班子寒假战略研讨会召开

2月15、16日，北京大学2017年领导班子寒假战略研讨会在中关新园1号楼科学报告厅举行。本届研讨会旨在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聚焦“立德树人”，深化学校综合改革，认清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为一系列应对举措确定基本思路。会议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校长林建华分别主持，校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

15日上午，研讨会开幕，郝平首先就2017年学校工作的总基调、总原则发表讲话。他说，2017年是党和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化党建工作的关键之年，大事多、要事多、任务重。北大作为全国高校的排头

兵，必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保持政治定力，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总原则：第一是“方向稳”，必须坚持党的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第二是“步子稳”，必须力戒浮躁，调整节奏，扎实推进每一步改革；第三是“办法稳”，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对实际问题提出“稳而高效”的解决办法。在“稳”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找准“进”的切入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勇于创新、勇于变革。

林建华介绍了2017年北大各项工作的总体思路：结合“两校一市”试点，立足国家需求，以综合改革为牵引，带动学校整体工作；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立德树人”为使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注重校风、师风、学风建设，完善教师行为规

范和评价体系，创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生态。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校党委常委、校长助理，部分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单位参会代表纷纷为北京大学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

林建华发表总结讲话。他说，党和国家对北大寄予厚望，希望北大建立一个可持续改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全国高校提供借鉴经验，弥合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因此，我们还应站在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上，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在本科教育方面，学校应通过制定政策调动院系和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关注师生诉求，完善其考评体系。创新创业学院的成立将会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必须做好相关工作，推进学校“双创”基地建设。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争取本学期落实奖助新体系，实现平稳过渡。在科研领域，学校要努力促进临床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同时鼓励学部层面上的学科规划，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大力支持医学部和深圳校区的发展。人事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是使人员结构、体制更趋合理，使北大更具竞争力。校园建设则须抓住机遇、稳步推进，谋求长远规划。另外，财务工作、思政工

作、国际合作等方面也要加强管理、重在落实。

郝平最后指出，本次研讨会谋划了2017年北大的发展战略，内容丰富，注重实效，各部门对学校重点领域里的改革进程汇报翔实，主题鲜明，会上提出的意见、思路也很中肯，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并尽快落实。他强调，北大的工作千头万绪，各部门必须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办学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学校内部利益群体的关系，“立德树人”和学校其他工作的关系，党的工作与教学、科研、行政的关系，中央巡视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他向各级干部提出五点要求：第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第二、突出重点，抓紧落实；第三、依法治校，依章办学；第四、尽职尽责，勇于担当；第五、师生为本，全心服务。只有做到以上五点，才能以饱满的热情办好2017年的大事、要事——配合中央巡视工作、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议精神、开好学校第十三届党代会、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迎接北大120周年校庆，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文/校报记者 王紫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大师生纪念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 100 周年

2017 年 1 月 11 日上午，元培学院在蔡元培先生铜像前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00 周年。校长林建华、副校长高松，蔡元培先生的孙女蔡磊珂及北大师生代表向蔡元培先生铜像献花。纪念活动由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主持。



林建华、高松向蔡元培先生铜像献花

蔡元培先生出生于 1868 年 1 月 11 日，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1916 年 12 月 26 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17 年 1 月 9 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正是因为

蔡先生注重学术研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从而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学术精神，北大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对于当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01 年，北京大学启动以蔡元培先生命名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元培计划；2007 年，元培学院正式成立。15 年来，元培学院始终积极稳妥地推进北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今天，元培学院在蔡元培先生诞辰 149 周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主旨就是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林建华曾担任首任元培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蔡元培先生执教北大期间对北大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引用了美国哲学家杜威对蔡校长的高度评价：“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林建华讲道，我们今天纪念蔡校长，是为了弘扬元培精神。北大人要有志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复

兴、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天的北大比起 100 年前，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要铭记蔡先生的教诲，真正把北大办成引领中国未来的大学。林建华还强调，元培计划是北京大学实行教学改革的“尖刀班”，通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仅体现在元培学院本身的发展上，也体现在整个学校的教育改革成就上。教育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我们仍然在路上。“让我们共同纪念元培校长，也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北大办得更好。”

元培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高松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蔡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强调，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思想理念一直传承到现在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之中。高松讲道，元培学院在北大的教学制度、教育方式上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他希望元培学院能够不断地继承元培思想，做好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为北大和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蔡磊砢女士代表蔡元培先生的家人对林建华校长和高松副校长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对元培学院组织本次活动表示由衷的感谢。她说，蔡先生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就任北大校长，在

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蔡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以我们的民族利益为先。北大精神，应当是怀抱远大理想、坚定的目标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她在发言中对元培人提出了深情期待，愿元培人将元培精神发扬光大。

最后，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沉筒代表元培学院师生发言，他讲道，一百年前的中国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是元培先生领导北大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元培学院作为引领时代的一面旗帜，要用自己的努力造就新一代的领军人才。

校史馆馆长马建钧、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陈洪捷、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李航、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李祎，元培学院副院长苏彦捷、副书记丁夕友等教师代表和元培学院的同学们也一起向蔡元培铜像献花。1月11日晚，元培学院在俄文楼 201 教室为北大师生播放了专题片《先生：蔡元培》。同学们在参加了系列活动后纷纷表示：纪念蔡元培先生是北大人的集体回忆，是为了推动改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百年来，北大风雨兼程，弦歌不辍，滋养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执着奋进的北大人。明年是北大双甲子的华诞，也将是

蔡元培先生 150 周年诞辰，作为北大人、元培人，应当再接再厉，传承元培精神，为北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大继续教育学院召开领导班子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开好 2016 年度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和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认真开好 2016 年度院系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通知》文件精神，2017 年 1 月 9 日上午，继续教育学院在燕园大厦 13 层第一会议室召开领导班子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主管校领导、副校长高松，督导组成员、校党委组织部党建办公室主任张婧，以及院党委委员廖来红参加会议。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章政，院党总支书记李胜，副院长、党总支副书记杨虎，副院长舒忠飞、屈兵出席了民主生活会。会议由李胜主持。



会议现场

本次民主生活会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召开前，领导班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深化学习研讨，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掌握《准则》基本精神和《条例》基本要求，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严从实开好民主生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广泛征求意见，学院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置意见箱、谈心谈话等渠道，广泛向群众征求意见建议，发扬民主、开门纳谏，重点听取了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担当方面和对学院整体工作的意见建议。班子成员会前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会诊”，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开展谈心谈话，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同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相互之间、班子成员和分管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之间分别谈心，相互沟通思想，谈透问题，增进了解，对于自身和对方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以及改进提高的方向形成了共识，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了良好氛围；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对照民主生活会前征求到的意见，紧密联系思想认识、工作实际、岗位职责、个人成长进步经历等，进行党性分析，深入剖析根源，认清问题实质，提出了整改的具体措施，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对照检查材料和发言提纲。

会上，章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对照检查，从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风、担当作为、组织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分析班子实际情况，指明存在的各类问题，并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改进工作作风等整改措施。领导班子成员逐一做了对照检查，聚焦政治是否合格、执行纪律是否合格、品德是否合格、发挥作用是否合格等内容，开展了自我批评，班子成员相互间进行了坦诚的批评。

高松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民主生活会准备充分，程序严格，剖析问题触及思想，对学院发展和班子建设是有益的。班子成员要继续加强政治意识，绷紧理论学习这根弦，在开展继续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方向正确，同时将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从学校发展大局出发，发挥继续教育在北京大学创建“双一流”建设中的作用，做好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做好风险防范。



高松讲话

张婧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她表示，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措施，本次会议准备充分，形式规范，自我剖析深刻，相互批评不打马虎眼，取得了切实效果。

章政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总结，认为学院领导班子整体态度认真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真诚、一针见血，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对照检查表明，学院及班子成员在很多工作中还存在不足之处，要以此次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欢迎领导及督察组未来给予更多的指导和监督。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大继续教育学院与校内专业院系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1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继续教育2016年度总结交流会召开。在总结交流会上，继续教育学院分别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育学院、经济学院、深圳研究生院和信息管理系等11个院系签署了院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北大副校长高松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继续教育部部长刘力平教授主持签约仪式。

北大继续教育学院是全校举办继续教育的专门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和各地方委托的干部教育培训，在举办继续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北大各专业院系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项目研发等方面具有充分优势。继续教育学院与校内各专业院系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贯彻学校第895次校长办公会“着力提高继续教育学院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竞争力，鼓励院系与继续教育学



院开展合作”精神的重要举措，旨在提升全校继续教育核心竞争力，推动专业院系全心全意建设“双一流”。

在签约仪式之前，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章政教授就扎实推进院系合作进行了说明。他指出，继续教育学院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服务好学校的核心使命。此次签约首先是学院对学校第 895 次校长办公会精神的具体落实；其次，学院对于院系合作的定位就是要服务学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服务各专业教学院系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教育学院与专业教学院系合作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好、维护好北大继续教育品牌。章政进一步阐释，要以做增量为主要合作目标，除非合作院系有需求，否则不影响合作院系正在开展的传统优势项目；可以优先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培训项目，致力于成为跨学科专业建设的“孵化器”；在经济利益分配上要向专业院系倾斜，继续教育学院在合作中不以赢利为目的。

在继续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帮助下，协议签订之前，继续教育学院与相关院系进行多层次良好沟通。学院首批与 11 个院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期能够充分挖掘专业院系师资课程及教学优势，结合继续教育学院的市场开发和管理服务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实现教学相长，进而推进各行

业领域高端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提升，推动北京大学产学研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转化，也进一步提升北京大学通过继续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继续教育学院与相关院系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共享各自优势资源，在相关领域探索开展非学历教育及相关方面的合作。继续教育学院与相关合作院系通过努力，将共同打造出北京大学继续教育系统内的高端品牌，共同为建设具有鲜明北大特色的世界一流继续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本次院系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院系合作全面展开，必将开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学校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周有光、督查室主任余俊、财务部副部长邵莉、审计室副主任雷洋昆、继续教育部副部长杨学祥、继续教育部副部长刘广送，以及各院系代表共同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见证了签约仪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厉以宁教授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本届终身成就奖分别授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陈先达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主任马凯为获奖者颁奖并发表贺词。



颁奖典礼现场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我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名字命名，每年表彰两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学者，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科各一人。经过多年发展，该奖已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马凯对两位获奖者表示祝贺，并肯定了他们在各自领域里取得的卓越成就、为国家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表示，两位先生获此殊荣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他们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品格，恪守真理、追求正义的风骨，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精神，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人们永远学习并发扬光大。

“我去参加经济宏观形势和改革的一些论证会，经常会碰到厉先生。无论是他的经济分析，还是对于改革方案的比较，他的观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到现在，厉老师仍然活跃在经济领域的第一战线。我看昨天厉先生参加了一个经济论坛，他说金融改革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不能自由化，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马凯表示，厉以宁教授对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股权改革、资本市场建立的贡献有目共睹。

马凯特别强调，两位先生不但在各自领域成为大家，而且他们几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虽然都是86岁高龄，至今仍然在为培养祖国人才勤奋耕耘。



马凯还在现场引用了厉以宁教授所作的一首词《江城子》：“虽过八旬，敬业在课堂。试问平生何所愿？青胜蓝，满庭芳。”

对于此次获评，厉以宁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经济学界，任何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这是因为：怎样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谁也不是先知先觉者，谁也不可能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就提出今后改革的走向，大家都在探索中。当时我大约 50 岁，不少年长的前辈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提出了真知灼见。许多同我年龄相近的经济学家们深入实际，前前后后撰写了许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还有一批又一批大学毕业生投入改革和建设的探讨，他们逐渐成长为当前经济学界的主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终于在老中青三代组成的经济学家群体中日益发展、日益充实。因此，我不仅要感谢前辈经济学家和同年龄经济学家，也要感谢在这个领域内成长起来的学生辈的经济学家。谢谢所有为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们。”

厉以宁教授生于 1930 年，他经邦济世、心系民生，从股份制到《证券法》、从民营经济到扶贫开发、从林权改革到低碳经济，每件事的推动都折射出其心血和

智慧。86 旬高龄，他至今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西方经济史探索》《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工业化与制度调整》《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论民营经济》……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60 余载春秋，厉以宁教授传道授业、因材施教、桃李满天下，他的教诲不断激励着学生们奉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各条战线上。厉以宁教授孜孜不倦地兴办商学教育，在北京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创立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一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商学院的旗帜，为中国商学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厉以宁教授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在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分析、教育和经济增长、就业问题、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和论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大校友屠呦呦荣获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 年 1 月 9 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大学校友、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荣获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屠呦呦一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院士。

屠呦呦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参加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 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先后分别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北京时间 2015 年 10 月 5 日，屠呦呦因在疟疾治疗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荣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此外，大会还揭晓了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评选结果。在五项奖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获奖者不超过 2 名，奖金为每人 500 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主要奖励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或者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这一奖项的首届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个人，从奖项设立至今，共 27 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度通识教育教学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下午，由教务部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2016 年度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教学研讨会”在新太阳中心 205 会议室举行。来自 17 个院系



的近 40 位通识核心课和通选课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教务部部长傅绥燕、副部长强世功，副教务长李沉简、方新贵，以及教务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研讨。

高松认为未来社会遇到的问题往往是不可预见的、复杂多变的、全球性的，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北京大学有很好的专业教育基础，在做好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把通识教育融合进来，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品格以及他们批判性地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合作、沟通、自我学习等能力。他强调，要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而不是简单地结合，不要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对立起来，通识教育不仅仅是通识课的事情，在开展专业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其他能力的培养。

傅绥燕介绍了教务部有关通识教育理念和通识课程体系的思考。针对 11 月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对学校通识教育提出的意见建议，教务部对通识核心课的体系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中国文明及其传统”和“西方文明及其传统”课程合并为“人类文明及传统”，新增了“思维与能力”类课程。对于通识核心课的建设，她表示要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但要有专业的深度，能够从独特的视

角，促进学生深入的思考。在教学方法上，不同课程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授课方式，重要的是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培养品德和能力。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陆一老师分享了“2015-2016 年度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深度调研报告”。她指出，总体上北京大学的通识核心课程教学情况较好，学生评价很高。她建议通识类课程的教学要有特别明确的学习目标，提升学习意义感，在提高学业挑战的同时应加强有效指导和学业情况的及时反馈。她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强通识核心课程的投入力度，在既有通选课的基础上不断孵化出更高质量的课程。

随后会议按照文理科分为组，在两个会议室分别进行讨论。文科组的讨论由强世功主持，理科组由李沉简主持。

分组讨论中老师们结合自己的课程分析了通识教育的目标、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通识课程的内容及教学、通识核心课程的评估以及工作量认定等问题。

对于通识教育的目标，老师们谈道，通识课程是教养性的课程，北大的学生应该是进取的、阳光的、谦虚且包容的，有胸怀有气势。通识课要培养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审美的能力和想象力，要



通过通识教育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跨界人才，引导学生发现学科之间的联系。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应该知道各学科重要体系或思维方式。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老师们谈道，需要找出完成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的课程，要组织动员，要以学生为出发点来建设课程体系，而不是从老师的角度看自己能开设什么样的课程。课程体系的建设除了精，还要考虑结构性，突出北大特点，希望课程体系的建设兼顾文理科学生。

在通识课程的内容方面，老师们谈道，通识课是建立在专业之上的。通识课程不强调知识系统完整，而是通过某一专题（案例、概念），帮助学生了解看待世界

的方式，强调的是深度而非广度，要强化理解，让学生有深刻的感受，而不是泛泛的认识。

在通识课程的教学方面，老师们谈道，不需要太多的强调学生课外用了多少时间，重要的是课堂效率。有老师认为除了老师的讲授，上课过程中的互动也很重要，如利用教学网、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课堂互动。

研讨会上还讨论了通识核心课程的评估等问题。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校领导出席“网络新青年”培养与思政教育创新座谈会

2017年1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网络新青年”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座谈会在新太阳学生中心204室举行。校党委书记郝平、副书记叶静漪出席会议，2015、2016年度“网络新青年”获奖同学，未名BBS站务组负责人、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骨干、e+网络新青年联盟负责人等新时期北大校园“网络文化代表队”的主要代表，以及学校网教办各

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网教办（青年研究中心）主任蒋广学主持。

会议开始前，郝平首先察看了青年研究中心，了解中心的基本情况。蒋广学简要汇报了中心在网络舆情管理、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思政教育和《北大青年研究》杂志编辑及青年工作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座谈会上，大家观看了 2015、2016 年度“网络新青年”颁奖视频，回顾“新青年”们的典型事迹。蒋广学扼要汇报了网教办在网络育人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学校网教办立足青年研究中心的传统业务和工作转型，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遵循互联网环境下学生成长和教育的基本规律，充分调动青年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不断探索北大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思政教育的理论模式和实践路径。2015 年启动的北大“网络新青年”评选与培养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突破与创新，“新青年”不仅传承了北大百年来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更在互联网时代注入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内涵，“网络新青年”的选树是对创新人才培养及思政教育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具有示范意义。



座谈会现场

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的高瑀泽入选了 2016 年北大“网络新青年”，她带领的团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为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他们的直播点赞数达到观看人数的 50%以上；2015 年北大“网络新青年”的代表“南燕新闻社”来自遥远的深圳研究生院，他们以记者般的敏锐目光描绘南国燕园的美丽风影；BBS 的站务总监回顾了未名 BBS 发展历程，强调未名 BBS 是一个重要的社区互动平台，是北大师生的网上精神家园；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代表提出，网络文化节的成功举行与网络新青年的评选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与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期待给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能越来越大，网络文化建设之路能越走越宽。

学生代表们的发言给在座老师带来很大的触动。计算中心的张蓓老师对网教办的前沿性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表示将会给北大网络新青年们更多的技术支持；研究生院的贾爱英老师认为 BBS 已经成为他们了解学生日常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基础平台，基于这个平台研究生院将建立快速反应回复机制，期望能与学生更好地展开网上互动。



郝平讲话

会议最后，郝平作总结讲话。他首先对荣获北大“网络新青年”荣誉称号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对他们将自己的一腔热情投入互联网文化建设、在网络这个大平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创造力表示大力支持和鼓励。郝平指出，同学们对网络与校园的热忱是十分可贵的，学校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学校各单位、各部门对网络文化建设和思政教育工作要大力支持与主动配合，学校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扶持和奖励力度，构建完善的支持体系，使“网络新青年”的选拔、培养、教育工作成为长期化、常态化的工作。他表示，“书呆子”“掉书袋”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结果将是走出象牙塔后无法融入社会。他强调，要鼓励学生通过网络互动参与校园管理，学生

是校园的主体，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带动校园管理，才能盘活学校管理的一盘大棋。学校要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未名 BBS 和 Pku Helper 等学生使用度较高的校内网络信息平台进行信息的整合发布，打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及时将学校发展改革建设的权威信息传达给全校师生。郝平表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中心任务，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育人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密不可分，新时期的北大“新青年”们要发挥榜样作用，带动更多同学参与到建设校园网络文化、传播网络正能量的进程中来。

郝平的讲话得到在场师生的热情“点赞”和掌声回应，他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祝福，并与在场师生合影留念。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郭海，以及学生工作部、教务部、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校团委、计算中心、新闻与传播学院等网教办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文/蔺芳）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民盟北大委员会走访 96 岁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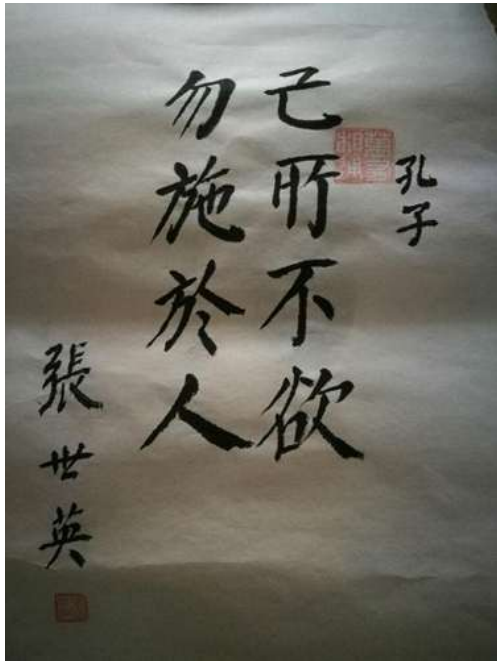
2017 年 1 月 10 日下午，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李玮，副主委宋春伟、李少华，以及民盟中央宣传部干部姜玲玲、李朝俊，一起来到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张世英先生家中拜望，为老先生带来民盟北京市委颁发的 40 年以上盟龄荣誉奖和纪念品，并送上民盟组织的亲切问候。

张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湖北武汉人，1921 年出生，1941 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转入哲学系，1949 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后曾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1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 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曾负责《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兼任过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学术带头人，《黑格尔全集》编委等。主要著作有《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评述》《黑格尔（小逻辑）译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欧洲哲学史稿》《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还创办

并主编了《德国哲学》与《中西哲学与文化》等刊物。



张世英先生虽已 96 岁高龄，仍旧身体硬朗、思维活跃，记忆力超凡。他向前来拜望的民盟同志回忆了很多往事：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名师如云，学术气氛空前开放，闻一多、沈有鼎互听对方讲周易，正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典范；刘文典狂放不羁，但学术精深，仍受到学生欢迎。张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绘声绘色，让几位晚辈听得入了迷。告别时张先生还给每人赠送了亲笔签名的著作及墨宝。大家相约下次再来聆听张先生讲述历史，并祝愿老人福寿安康，新年快乐。



张世英书法作品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网教之声

“慕课”的六大发展趋势

“慕课”在快速发展，其所带来的变化是信息技术诞生以来的重大变革之一，将深刻影响未来的高等教育。就目前所见，我们大致可以预见到其未来发展有大致如下六大趋势。

慕课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慕课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慕课的供应商也会继续增多。除了现在三大供应商（勇敢之城、课程时代与教育平台）还在继续竭力扩展外，类似的机构也在迅猛发展，如可汗学院、点对点大学、人人学院等。他们都是与慕课相类似的组织。

可汗学院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在 2006 年创立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其使命是“要为世上的所有人提供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目前，可汗学院的网站上已经提供了成千上万的教育资源，在 YouTube 上有超过 5000 段的教学视频，这些内容全部免费向世界开放。据介绍，可汗学院每月登录的学生

超过 1000 万，而其课时数已经超过了 3 亿。数目相当可观。

点对点大学建于 2009 年，也是非营利性的网上教育机构，但它主张建立一种学习社区，特色在于帮助学习者组织起来，参与到课程的学习小组中，就某些具体的话题进行讨论式学习。现在一般的慕课还算得上是传统的课程，而在点对点大学，任何人都可以开设一门课程，即任何人只要对这门课感兴趣，就可以学习这门课程。

人人学院建于 2010 年，作为网上学习平台，使人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其特征是允许教师主导课程的学习。人人学院的特色体现在教师可以在网上出售自己的课程，课程主创者可以获得收益的 70%~85%，还可以保留个人知识产权。

新型慕课将走向独立

慕课的雏形，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用现代技术进行加工，再搬到网络上。学生的学习更多的是被教师个人魅力以及新型教学方法所吸引。而随着

人们将先进的网络技术用于高等教育，人们不仅发现了新天地，更充分发挥了人在慕课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技术在慕课中的作用），从而将慕课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目前，几大慕课供应商所提供的课程主要还是传统的课程，即以教师课堂教学为主，只是通过现代的技术方式表达出来。但这样的慕课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更加新颖的慕课正在出现。新型的慕课强调的是关联主义的教育理念。著名网络教育与新媒体的设计师和评论家史蒂芬·道恩斯将这两类分别命名为“关联慕课”和“传统慕课”。

所谓关联慕课，即遵循关联主义教学法的慕课，其不同于传统的教学特征和结构。比如他们强调聚合体，保证学习内容可通过通讯或网页让学习者随时接触；重组性，讲究课程内部人员间分享各种学习资源；重新定位，梳理与重组各种不同的学习资源，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个性需求；正向输送，将重新定位、重组过的学习资源与其他人员分享，并传递给世界上所有感兴趣的人。专家认为，关联慕课最有助于合作对话与知识建构。

由此可以看到，关联慕课在走向独立、成熟，并在努力与传统学习方法乃

至大学教育融为一体。由此不难推断，传统慕课在未来网络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将会逐渐减少，而关联慕课将会成为未来慕课的发展方向。

教师教育理念与方法将产生巨变

慕课无疑将会改变教师，而这种改变是从网络技术改变教学方法开始的。最初，由于网络课程吸引大批网民，授课可以影响更多的学生，这是很多教授愿意将自己的课程放到网上的原因。而一旦成为慕课课程，教师很快会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课程的唯一建设者了，而只是课程组的一员，唯有与技术员、传媒顾问、视觉专家等一起，才能制作出一期慕课课程。这就使课程成为一种合作产品。这无形中也促进了现实课堂教学中的平等关系。

由于课程是全程录像，也使教师能回头观察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再像过去只能依靠测验、考试或论文考查学生。千百年来，教师授课究竟如何，只有学生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放在网络上，所有人都能说三道四。由此一来，教师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优缺点。换句话说，教师也可以成为观众——学生，有机会反省自己的教学及其效果。这对教师能力的提高，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如今，很多教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学生能在网上随时看到名家课程，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去选修相同主题的课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已经愿意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去听这样的课程，而将个人课堂教学改为解答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完成集体项目。从结果看，这种方法更有效，也颇受学生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与主题的理解，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恰恰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学生的学习方法将大为改观

慕课的发展也将对学生如何学习、怎样有效学习产生重大影响。过去的课堂教学，学生只能聆听主讲教授授课，而现在则可以在网上搜寻众多的网络课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再从头听到尾，而是可以跳过自己已掌握的内容，重复播放难懂或还没有掌握的部分。而且目前很多网络课程不仅能自动回复学习者的问题，还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提问提供相应的帮助。

慕课的广泛流行，使人们在认识到技术、网络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以及快捷便利之处的同时，将会更加依赖技术，

也会出现更多基于网络的学习方法。比如有些学校将在线学习与离线学习结合起来，已经出现了被称为“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即要求学生在家或课下观看网络视频课程，完成相应的学习项目，课堂上则主要与教师进行互动，解决在线与离线时所遇到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但其效果远好于传统教学。据圣何塞州立大学与教育在线（edX）在2012年秋季的测验发现，这种新教学方法将过去传统课堂教学仅有的55%的通过率提高到了91%。

网络技术将推动教育的巨大变革

网络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大，甚至会推动整个教育的巨大变革。慕课元老特龙教授曾表示，慕课课程所带来的是挑战，而不仅是课程的变化。他说，这种方法打破在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教师效能与学生成果评价的教学神话，而代之以基于证据的、现代的、数据驱动的教育方法论，这种变化会带来教育的根本性变革。

慕课发展的一个重大结果，将会是用现代网络技术取代现有教科书。阅读教科书是传统的学习方法，除了使人学习新知识外，教科书还具有保鲜知识的作用。但现在，先进的网络技术既能使

人产生学习的兴趣，也同样能够达到传递知识的作用，其所具有的艺术乃至浪漫效果，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教科书所能带给读者的愉悦感。而有些人认为，慕课所提供的视频以及相关材料本身，就是新型的教科书。

现行教育体制将深受冲击

慕课对高校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加剧，且将对整个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慕课中，这股浪潮将席卷全球；其次，慕课的变革将会影响大学的教育生态系统，自然也会影响到大学的管理。如何应对慕课所带来的对传统教学与方法的巨大变化，如何面对新形势下的大学教育，是教育管理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再次，慕课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大“破坏性”变革，是其对现行教育运行体制的冲击。一般来说，传统的大学商业运作

模式大都是单个或分类提供服务，也因此单个或者分类进行收费，比如学术研究、课程设计、书本、教学、评估与获得学位乃至学生安置等。而现在的慕课则提供一揽子的全方位服务。这就对现行的大学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也有人称之为是慕课所带来的一种破坏性创新。

而更具威胁意味的是，一旦将来慕课供应商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学分，还可以授予学位，而这样的学位又能获得世人的认可，那么，这将对现有的高等院校带来怎样巨大的冲击，人们是不难想象其后果的。到那时，高等教育的变革不仅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而我相信，这样的变革，人们在今后的10年内就能够看到。

作者：郭英剑

来源：《中国科学报》

汤敏：慕课对传统教育有何冲击

“今天，一场新的教育革命似乎又来了。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程、自主学习等新概念令人眼花缭乱。”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近来关注慕课发展，并写成新作

《慕课革命》。汤敏认为，慕课改变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教育方式，“慕课对教育将会带来一种破坏性创新”。

慕课会以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方式解决教育难题吗

记者：您认为当前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最应该关注什么因素？

汤敏：研究教育的改革不能忽视工具的发明与运用。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始于某一生产工具的发明与运用，一些产业发生大的变化，最后引起了整个社会发生了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3D打印机以及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和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与新的工业革命遥相呼应，一场新的教育革命，慕课革命，也在悄悄地向我们逼近。尽管只是初见端倪，但它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以及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都不能低估。

记者：慕课的存在方式有何特点，带来了哪些革命性变化？

汤敏：慕课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最优质教育资源，让任何有学习愿望的人能够低成本地，通常是免费地学习。它正在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方式，使授课者与学习者能跨越时空，让知识获取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慕课对传统教育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

慕课是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学生不同，一门慕课课程动辄上万人，目前最多的达16万人。

慕课是开放课程，尊崇创用共享协议，以兴趣为导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不分国籍，只需一个邮箱，就可注册参与。

慕课在网上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

慕课使未来学校中的课程设计、学习评估，甚至连学生就业安置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以上这些，决定了慕课与传统教育有很大不同。

记者：慕课对于解决教育难题提供了哪些新方案？

汤敏：应该说，慕课甫一出现，就承担起解决传统教育难题的使命。比如，目前中国教育的三大问题：教育公平、学生创造力不够、大学生就业难等，慕课对此有自己的解决之道。

慕课的理念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能学到任何知识。”当边远省份二本、三本的大学生能够自由地选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课程并得到学分，当偏远贫困山区学生能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

远程同堂上课，当任何一位愿意学习的人都能上到世界一流大师的课程时，教育就会更加公平了。

用慕课方式学出来的学生与教师“满堂灌”的方式学出来的学生相比，在创新方面可能有更大优势。慕课会对学生如何学习、怎样有效学习产生重大影响。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速度来学习，不需要把一堂课从头听到尾，可以跳过自己已掌握的内容，反复地学习难懂的部分。

目前，我国企业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慕课的推广，有利于大学生根据经济社会需求选择课程，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记者：教育是改变命运，改变贫困代际传承的手段。慕课能以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方式改变学生命运吗？

汤敏：我举个例子，张宇鹏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学生，二年级时已经在网上修了40多门世界一流大学的课。他打算大学毕业后报考名校的研究生，继续走学术道路。

慕课会替代传统课堂吗

记者：慕课的课堂有什么特点？对学习方式带来了什么影响？

汤敏：慕课可以实现多对多的“众人可以同时发言、倾听或回应”，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课堂以及广播电视课堂“一对多”的局限性，能够实现大范围的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学习。这有助于改变当前老师“满堂灌”，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积极思考能力的大问题。

大体上来说，慕课的课堂有5个特点：

第一，知识点、短视频。远程教育和公开课只是简单把老师的上课录像放到网上去，而慕课把一堂课的内容分解成若干知识点，每节课都由10到15分钟的短视频组成。研究表明，最适合学习者集中注意力的视频长度一般不超过15分钟。

第二，随堂考试，满十分过关。慕课吸收了网络游戏中“即时奖励”等方法，整出了随堂考试模式。每上完一个十来分钟的知识点，计算机就自动跳出一些问题。只有全部答对，才能继续上下一堂课。

第三，兵评兵，机评兵。慕课动辄几万人，十几万人选一门课。这么多作业，还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老师如何改卷呢？对于简单的随堂测验，可用机器直接判分。而对问答题类的考试，就让学生遵守一定的规则互评，即“兵

评兵”。为防止串通作弊，系统随机匹配5个左右的互评者，取平均分。

第四，虚拟课堂，规模PK。尽管慕课以网上个人学习为主，但也在尝试通过网上论坛方式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联系起来，形成远程讨论模式。有的还设计出虚拟教室，有座位、有小组、有班长，以研讨话题形式把学习者联系起来，发挥“兵教兵”的作用。

第五，大数据分析，小机器跟踪。数据库把学生回答的每一道题、修改的每一次作业，参与的每一次论坛讨论等都收集起来。还会定期给教师发报告，分析哪一堂有效，哪一堂课无效。

记者：目前，学校教育的一大难题是提供足够多的课程，供学生真正能够根据兴趣、特长和需要来选择。在这方面，慕课有什么优势？

汤敏：在传统教育下，一所大学受教授规模及学生选课人数限制，只能开出几千门课。而在慕课大平台上，如果全世界教师都可以把自己的课挂上去，学习者就会有几十万门，甚至上百万门课可以选择。

记者：慕课给学生减轻负担了吗？

汤敏：孙小小是一名自由培训师，她选了斯坦福大学科技风险投资计划推出的《创意速成课》。“每周几分钟的讲座，都是干货，每周一次作业。”在作业分组中，组员大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网上讨论就要跨时区，她经常半夜爬起来参加小组讨论。

慕课的作业与考试负担一点也不轻。孙小小的一个作业是要求先找出100个和睡眠有关的问题，经小组讨论后挑选一个并给出解决方案。“一个西班牙人擅长做视频，最后决定让他做一个视频作为作业提交。他一口答应，接近提交作业最后期限时，他突然消失了。”孙小小回忆说。他们不得不紧急动员起来做了个课件，在最后时刻提交上去。

慕课会使教师失业吗

记者：慕课的大规模推广会不会造成大量教师失业？

汤敏：这是很多人的担心。最近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哲学系全体教师投票反对学校加入慕课，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学校减少雇用教授的数量。其实，慕课的线下工作同样重要。学生间的讨论，老师的引导与辅导非常重要。中小学生的慕课课堂，更需要线上的讲课与线下

的翻转课堂相结合。对程度不同的学生，老师还要给予辅导。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教师时间与努力。

记者：慕课或翻转课堂会为教师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汤敏：慕课或翻转课堂会颠覆传统的教学方法，改变很多教师的工作方式，会促进他们从“教”到“师”转变。

未来的教师更像一个导师，从以“教”为主，变成以“导”为主。在慕课制作中，教师只有与导演、摄影、美术、视频专家等合作，才能制作出好课来。在播放中，教师可以观察学生学习情况，帮助与指导学生，而不再像过去只能依靠测验、考试或论文考查学生。通过学生学习效果的大数据分析，教师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身优缺点，提高教学效果。

话又说回来，那些混日子的教师，在慕课革命下有可能被淘汰。各行各业天天都在大浪淘沙，凭什么教育领域就例外呢？

慕课会颠覆传统校园吗

记者：慕课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它对传统大学有什么影响？

汤敏：“大学是一个教授笔记直接变成学生笔记，并且没有经过二者大脑的地方。”马克·吐温在19世纪就这样讽刺大学。遗憾的是，即使是用于描述今天的大学，这话仍不算过分。

2012年10月，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杂志发表名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深度报道，探讨慕课给现有大学带来的冲击。文章说：“对学校官员来说，变化带来的恐慌随处可见。”

“开放，或者被抛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说，“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大学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有沦为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的风险。”

记者：您曾提到把职业教育课程制成慕课，职业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样做能行吗？

汤敏：在职业高校职业中学中，大部分的课程也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原则上说，凡是老师能在课堂上讲的课都可以“慕课化”。君不见，每天电视台上有多少烹调的节目，教大家做菜。事实上，现在的很多远程医疗课程，很多学生都可以在视频上看教授如何做心脏手术。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名为

“edU”的慕课平台上,也有一些如摄影艺术、头部与颈部解剖、马的基本护理和吉他入门这些很具操作性的职业化课程。

记者:如果把职业教育课程慕课化,目前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汤敏:我们可以考虑筹建两个慕课平台,一个是学校的统一职业教育慕课平台,一个由企业提供的职业教育慕课平台,形成一定的竞争。如果课程过多,还可以多建几个平台。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建平台。

记者:慕课会颠覆传统的“大学校园”吗?

汤敏: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2013 年预测,“未来 50 年内,美国 4500 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大学校长们都在担心,人们再也不愿意每年花几万美金到大学里去学习了。

也有人说,上大学重要的是要学校中的氛围。让学生能住在一起,开展学生团体活动,校友之间互相帮助、提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还是要有的。

我认为,大学最好还是不要消失,但是,有大学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把传统的教学方式一直保持下去。

记者:杨桂青

来源:《中国教育报》

■ 北大人物

邵子剑：支教边疆，是生命中最受用的大学

临近毕业，看着同窗都在为找工作或出国留学而忙碌，24岁的北大研究生邵子剑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颇感“荒诞”的决定：休学一年，去西藏支教。

这已是邵子剑第二次休学去边疆支教，上一次是新疆。这样的毕业季选择，让他的人生显得与众不同。

“人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我能做的，就是增加生命的厚度。”他说，“新疆的一年已让我坚信，行走在祖国边疆的路上，才是我生命中最受用的大学。”

2013年7月，本科刚毕业、保研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邵子剑，作为学校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保留学籍一年，志愿到乌鲁木齐的新疆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支教。此前，对于新疆，他印象中只有哈密瓜、葡萄和羊肉串。然而，真正踏上边疆的土地，他才知道一切并不容易。

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10多个维吾尔族大学生，异域的面孔，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让他感到自己才是“少数民族”；

刚到宿舍，遍地都是蟑螂，天气燥热没法洗澡，只能到旅店开房洗……



邵子剑与新疆学生合影

新疆学校缺老师，邵子剑要教英语及政治类的9门课程，一个礼拜最多要上22节课。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兼做行政工作，生活忙碌充实。为更好地与学生交流，他一有空就去图书馆翻看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书，甚至还到其他老师的班上去听课学习。

慢慢地，学生们发现，这个从北京来的、跟自己年纪相仿的老师，不仅讲课幽默风趣，见闻广博，还非常爱笑，“笑起来牙齿最白”“唱红歌也很棒”。

他指导大家排演英语话剧，还开展“我的中国梦”征文活动和英语演讲比赛。新颖的教学活动中，大家对学习有了更多兴趣和动力。

为提高学生的英语成绩，邵子剑和北大其他3名支教同学一起，利用晚自习，首次在全校开授英语四六级课程，每次来听课的都几百人，“教室都坐不下”。一年下来，学生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大大提升。

针对南疆双语教育的薄弱和不足，邵子剑团队还发起了“言传远疆”在线教育项目，联系企业，审核教案，教授经验，每周组织汉语流利的当地大学生对南疆两所合作小学开展远程汉语教学，300多名学生因此受益。

一年期满，邵子剑重返燕园。然而，临行前学生们不舍和期盼的目光总让他难以忘怀。“像我们这样大城市成长起来的孩子，先天就有富足的生活、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但这些对边疆地区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奢侈。如果不去支教，我不会如此深入他们的世界。”

2014年底，研究生在读的邵子剑再次向北大团委递交申请，再休学一年，前往西藏支教。为了不耽误学业，他在赴藏前的一年时间内，上完了所有的硕士课程，修满了学分。

2015年8月，邵子剑前往西藏，如愿成为拉萨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如今，他每天为60多个藏族学生上英语课，兼顾教科室纷繁的工作，依旧忙碌。

与在新疆支教不同，中学升学压力大，学生们基础差却还整天嘻嘻哈哈，这让他很有些着急，每天赶着学生背单词背课文。而高原反应也让他不太适应，“讲课一讲快了就又喘又晕”。

“我本科同学工作快三年了，研究生同学也都毕业了，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他说，“但我并没觉得吃亏，我要趁年轻多来西部看一看。停下，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除了付出，还有感动。当他突发急性肠胃炎，躺在医院输液10多个小时，一贯顽皮的学生突然深夜发来短信，让他不禁潸然泪下：“老师，你要安心养病，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请你放心。”

邵子剑说，他只是一名极其普通的支教者，没有响亮的口号，也没有动人的故事，但“支教真是个良心活”。

10多年来，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已有200多名学生志愿到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支教。在祖国边疆，一批批燕园学子，接力着支教的火炬，一曲西部行唱出当代青年的选择和坚守。

邵子剑给记者讲述了很多支教故事：在青海玉树一座山上的小学，同学宋文轩靠烧牛粪取暖为孩子们上课，经常嘴唇干裂，讲课讲到声音嘶哑；师妹郝婧青独自在大理一所高中支教，见到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而和他一起援藏的女生邓筱每天改作业都要到深夜，每周还要约藏族学生谈心。

许多人问，支教一年又能改变什么？邵子剑的答案是，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要去做，因为“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这个时代从不缺乏理论家，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踏实去看、去听、去实践。只要用心，对人对事就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传递意识比传递知识更加重要。”邵子剑希望能带给学生更多正能量，让其更积极、努力地为未来打拼。“用心感知他们的世界，共同行走在生活的大道上，我们就是他们，他们有一天也终将成为我们。”（转载自新华网文章《北大青年：支教边疆，是生命中最受用的大学》）

邵子剑支教日记节选

（一）

一周以来，每个教过的班级，学生都要和我们几位即将离开的北大老师合

影。因此，教学楼正门的台阶时不时被一整个班的学生堵住，引来其他班级的学生和任课老师的围观。很多没教过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都没给我们班上过课就要走了，太不开心了！我们一定要拍张照片，想你的时候，看看照片也行啊。有一次在学校草坪上合影，教务处闫主任正好路过，她笑着对学生说，你们快点 and 北大老师合影，以后他们都要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于是，学生便说，老师，你就站那摆好造型别再动了，身边的人来回换就行了。我跟学生说，你们拍好的合影一定要传给我，我一个一个命好名，也让我在想念你们、想念新疆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更令人感动的，是二年级的思政班。这两个班刘校长和老王都教，上学期由于刘校长生病，我给他们也代了一个月的课。离别前，他们班级精心准备了一场班会，来欢送我们“四剑客”。唱歌、跳舞、祝福，当曲终人散之际，他们自发地唱起了张震岳的《再见》，每一个人都无声地留下了舍不得的眼泪。正如我在给学生的信中说的，也许，这一别，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会再见了。

——2014年6月22日

（二）

上课的时候对练习答案，猛然抽查了部分同学的作业，居然发现有近 20 人的作业本是空白的。平时我很少看学生的作业，一来是我比较懒，二来是我觉得都这么大人了，做不做全凭自觉。所以，我通常是上课的时候跟他们对答案。再说了，信息这么发达，练习的答案哪里都能找到，他要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就在我眼皮底下不写作业，我还是非常生气，骂了他们半节课。我要求课代表把他们名字记了下来，打算给班主任，并对他们说，再不写作业下次就去政教科报到，不用来上课了。一听说我要把名单给班主任，他们马上苦苦哀求，班长还冲上来担保，说他会监督他们写作业，千万不要将这件事告诉班主任——在拉中，每个班的班主任都很有“权威”，学生在他们面前基本就是“一贴药”。我说，你们就是欺负我年轻，不写英语作业，我看你们期末考试考多少分。他们说，老师，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科室老师事后听说了，感叹道，20 个人不写作业已经算少的了，好几次他们教的班有一半学生没写，也是一顿狠狠的骂。我摇摇头，骂他们其实一点用没有，不写的学生依然不会写。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三)

汽车在高速公路奔驰，此时我多么希望它能够开得慢一点。我无言地望着窗外，试图用眼睛记住在高原的最后时刻。天还是那么蓝，阳光还是那么明媚，绿树又一次成荫，雅鲁藏布江的河水始终净得能照出灵魂的色彩。一切都和一年前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印象一模一样。只是日历无情地翻过，断断续续地记载了在这里度过了几百日的闲暇时光。这是我硬生生从青春中偷来的时光。如今，“水晶鞋”的时间到了，一切都该回到原来的样子，回到原本就该走完的路上。

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不受控制地播起了往常的日子，但只有镜头，无法串联。我想起了五个人第一次吃的牦牛肉火锅，硬邦邦的肉让我当晚腹泻不止；我想起了第一次爬上楼顶看星星，满足了从小到大生活在大城市却一直奢望的星空梦想；我想起了第一天到教室报到的紧张和忐忑，高阿姨笑眯眯地对我说着欢迎；我想起了第一次出城去日喀则的惊喜，想起了班主任格春第一次见面就把我当成电脑修理工，想起了八班的学生不好好听写被我一顿臭骂，想起了他们边流眼泪边抛起高高的哈达向我道别……我想起的镜头有很多，直

到最后控制不住。我有点眩晕，感到头疼。

如今，当我回忆起在西藏的点滴过往，却发现自己在这片土地留下的都是些非常平凡的故事。我做的很少，微不足道。我只是拉中辉煌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只是近百位汉藏学生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只是西藏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匆匆过客。但他们却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我品味，让我流泪，让我深深怀念。我应该知道，当踏上雪域高原的那一刻起，这片土地

终将在我的生命里踏出无可磨灭的印记，让我不知从何时起，爱得深沉。

——2016年8月20日

注：上述文章为邵子剑支教日记的节选。邵子剑在参与第十五届、十七届研究生支教团赴新疆、西藏支教期间，总计撰写日记40余万字，生动还原了西部支教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工作面貌，更体现了一名俯身下沉的北大人对基层社会现象与问题的深刻思考。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杨柳教授：患者眼中的光明使者

医德若水，滋身润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的杨柳教授工作近三十载，她总是将心比心地做人，身先士卒地做事，兢兢业业地做学问，是最让患者们信任的那一类医生，沉静而麻利，和悦而干练，柔中带刚的性情里不仅传递出自信，而且能给他人注入希望。经过职业的历练和精神的修行，她成长为一位品高行正、意志坚韧、追求执着的医者。在病人眼里，她是光明使者，是杨柳春风。

杨柳出生于1965年1月，中共党员，眼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8年，她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此后一直在北大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承担临床、教学、科研等多重工作。目前她担任眼科主任、北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院工会主席。1996年，杨柳教授获得博士学位，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一位在职申请博士学位获得者，2001年11月至2003年12月赴美国哈佛医学院 Schepens 眼科研究所做博士后，哈佛

医学院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做访问学者，主要工作领域是视网膜、青光眼和葡萄膜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工作中的杨柳

优秀的医者 光明的使者

杨柳有着渊博、扎实的眼科专业知识，掌握高超娴熟的手术技术，主要专业领域是视神经视网膜、葡萄膜疾病。

由于眼睛的结构精细而脆弱，因而眼科手术也是一项极为精细的手术，杨柳把“厚德尚道”的精神和对患者的爱，全都融进了精细、准确、高超的手术技巧之中，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视网膜的各种手术，她都做得游刃有余。每年都会有数百例患者通过她的精心与巧手重见光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要接诊无数来自全国各地、慕名求医的患者，对各种疑难性眼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亲手操刀完成包括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疾病等

在内的多种复杂的手术。每次，当杨柳看到一位新的患者在自己的精心治疗和手术后重见光明，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欣慰与乐足。她常说：“患者充满信任的眼神是我最大的收获，一台漂亮的手术是我最大的满足。”

杨柳在国内外眼科学界享有盛誉，目前在许多学术团体兼职。她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眼免疫学组副组长，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女医师分委会委员，北京眼科学会委员，北京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常务理事。

“治未病重于治已病”，杨柳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格外重视眼病的预防与健康教育。她在国内积极推动眼病健康的科普和公益活动，除了向自己的病人进行健康指导，长期以来，她还带领北大医院的眼科团队每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眼病知识宣教活动，并多次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多个省级电视台举办关于眼科疾病的科普讲座。她所在的科室每年还会不定期地为患者举办科

普讲座，组织患者俱乐部，并且免费进行眼科检查。她曾多次组织科室参与卫生部组织的“健康快车”“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等公益活动，义务为众多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实施白内障手术。

2014年，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加勒比地区时承诺的向该地区提供援助的指示，国家卫生计生委首次向加勒比地区派出医疗队，同时也是首次派出短期白内障手术的医疗队。杨柳肩负着祖国的重托授命带队，两赴加勒比地区，为巴哈马、多米尼克两国的白内障患者免费进行手术治疗，她用自己精湛的医术、高贵的举止和典雅的微笑在为巴哈马、多米尼克两国人民带去光明的同时，更带去了中国人民诚挚的友情，她出色地完成了“光明的使者”“友谊的使者”“和平的使者”的角色和任务。

另外，杨柳还将中国眼病的预防与治疗工作与国际接轨，她是“美国女性眼健康组织专家委员会”唯一的一位中国专家成员，每年参加由美国著名的眼科专家们组成的女性眼病健康论坛，并且代表中国介绍中国在眼病健康教育与防治方面的所取得的成绩。

在杨柳担任眼科主任的8年时间里，北大医院的眼科医疗队伍和技术影响有了突出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已经跻身眼

科学术界的第一梯队。然而，这个成绩并不是杨柳教授的最终目标，从2008年开始，北大医院眼科与美国哈佛医学院眼科建立了姊妹医院合作关系，每年互派专家和年轻医生进行学术交流，她带领北大医院眼科正朝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在巴哈马的第一台白内障手术

站在前沿的临床科学家

杨柳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绝不能仅仅只是一个临床医生和手术匠。”她对自己和学生的定位是必须成为“Clinician-scientist”——临床科学家。

凭借自身在科研方面的敏锐洞察力，杨柳始终让自己站在眼科学科的前沿，不断追寻和探索眼科学中的未知领域。杨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视神经再生和视网膜疾病的神经损伤和保护，她与

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合作研究的视神经再生项目，国外媒体包括英国 BBC 评论该研究是“人类首次使视神经再生，由眼球长到脑内靶组织”。同样，也是她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视网膜疾病存在神经损害，需要进行神经保护的概念，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国内眼科学术界获得推崇。

杨柳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985 计划二期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一五”多项重大课题和多项重点课题的研究。

杨柳还参与编辑或编写了很多部著作，主编《现代眼科诊疗手册》《葡萄膜炎图谱》十二五眼科教材《眼科学》等书籍，参与八年制医学生《眼科学》教材、《葡萄膜病》、《眼的解剖与临床》等专著的编写。她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首都特色项目、首都发展基金等的评委，担任多个学术杂志的编委，已在国内外重要科技杂志和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具有影响的论文。

杨柳说，他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国从落后到飞跃发展，他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梦想就是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努力让祖国强大。创新是科研的灵魂，而勤于思考、敢于探索、打破常规，则是创新

的前提。因此科研工作者必须要甘于吃苦、踏实工作，每天都要有所新知，有所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

丹心育花的良师益友

医学教育不同于其他的领域，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围绕着复杂的人体和疾病表现的高难度的教育过程，不仅仅是治病，而更多的是治疗一个复杂的人体。医疗教学不仅仅是在三尺讲台上进行，更多的是在诊室里、病床旁和手术台上，不仅仅是讲授书本上教条的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仅是治愈病患，更多的是要给患者真心的关爱。

杨柳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十分注重结合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使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得以充分融合，获得学生的广泛认可。尽管她的工作非常繁忙，她还是一直坚持每隔 2 周都与学生们一起进行小组讨论会，耐心讲解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精心指导学生进行课题设计。她常对学生们说：“做学术和做人一样，都需要注意平日的积累，所有的路都是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只有把每一个脚印都踩好，未来的路才能走得精彩，人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杨柳作为博士生导师，非常重视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她对每个学生的课题选择、研究过程都予以细致的指导，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都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为了培养研究生读书、演讲、专业知识学习的综合能力，她与同仁医院著名的眼底专家魏文斌教授一起带领两家医院的学生举办读书报告会。至今，这个活动已经坚持了8年之久。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杨柳甘为人梯，为她的学生们创造和提供各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为他们在国内、国际的眼科学界搭建展示自己的舞台。她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在世界或全国的专业学术会议上汇报发言，还推荐学生到世界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接受培训。自2011年起，她每年选送一名博士研究生到美国哈佛医学院进行交流学习。她的学生们在这些活动中获益匪浅，多次获得优秀论文等奖励，并在研究生演讲比赛、讲课比赛等活动中获得冠军。

在重视专业知识技能训练的同时，她还强调医德医风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无论何时何地，她都注意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和感染着身边的学生。她教导学生要尊重患者，善待患者，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要关注

患者的心理创伤。她耐心细致，和蔼可亲，关爱学生，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每当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遭遇挫折，她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开导并鼓励学生们走出阴影，看到希望。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开朗明丽的杨柳教授，她的生命也曾遭受到癌症威胁，但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险境，她总是非常阳光、乐观地对待生活。她常谆谆开导自己学生：“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在逆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如何，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

正是在杨柳的悉心培育和精心指导下，我们的年轻一辈医生成长起来了，杨柳教授也喜获桃李之硕果。由她教过的学生、进修医师现已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很多学生已经在当地和所在单位担任重要职务或成为学术骨干。在赴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和多米尼克两国时，她为当地的白内障患者免费进行手术治疗的同时，对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培训，留下了一支永不离开的医疗队，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和褒扬。

身兼数职的出色领导

杨柳教授身兼数职，但她将各项工作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兼顾并进，她凭

借自己的才能与智慧，把握各个角色的相互转换，并且将每一个角色都发挥到极致，演绎得精彩纷呈。

自 2006 年起，杨柳担任医院党委副书记，同时还兼任眼科主任的职务，成为医院管理、科室管理和医教研“三肩挑”的专家型干部。她的严谨、认真、执着、朴实和坚毅的性格，造就了她对每一个角色都非常投入，并力求完美。

作为医院党委副书记，杨柳是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她始终坚持理论学习，保持思想进步，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爱岗敬业讲奉献、开拓创新促发展的崇高情怀，努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工作勤奋，拼搏奉献。

自 2006 年担任院党委副书记至今，她一直主管院工会、宣传、统战、团委、学生思想工作。2008 年担任院工会主席，同年当选北大医学部工会副主席，之后还担任北京大学兼职工会副主席。她担任院工会主席 7 年来，医院工会工作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她带领院工会团队多次获得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教育工会等各级荣誉及各类奖项，继 2007 年医院获得“北京市

模范职工之家”荣誉以来，今年医院获得全国教科文卫体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她自己荣获北京市教育工会、北京大学工会、北京大学医学部评选的“模范工会主席”光荣称号。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杨柳同志的提议下，新一届教代会常设机构成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对于医院工会教代会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仁医之梦”与“仁师之梦”

对杨柳而言，医学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从举着右拳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成为一名白衣战士的信念就深深扎根于内心深处。三十年来，她的“仁医之梦”从未改变，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她说：“这是我医生的事业，更是我毕生的追求。”在这条漫长的从医路上，她走得很坚定，也很踏实。

她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个师者。师者，医人之灵魂，传道授业解惑。师者得良才而造之，得贤才而育之，则翘首可望黎明之曙光。杨柳始终在追求自己的“仁师之梦”，她把自己的知识、技术、理念传递给她的每一位学生，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就像一座灯塔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大爱千秋，师者无

痕，在我们的每一个看不见脚印里，都有沉甸甸的责任，杨柳也用她的汗水和辛勤铸就一个个精彩的人生，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与爱心培养出更多的将士贤才，让他们遍布大江南北，为祖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执掌木铎育桃李，执鞭教坛绽芳华。

杨柳用自己的光和热为患者送去光明，为患者家庭送去幸福；用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医德师德的楷模，使她的

学生们在医路成长的道路上笃学不倦；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谱写无私奉献的无悔人生。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绩，无论获得多么多的赞美，她依然谦逊，依然忙碌，依然勤勉，继续为自己所热爱的眼科事业辛勤耕耘，为医院的建设发展勤奋地工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学者谈读书

汤一介：我最喜爱的书

我读的书不算少，喜爱的书也很多，要选出十本最喜爱的书却不容易。现在我试试先选出五本“我最喜爱的书”，并且说说我之所以喜爱这几本书的道理。这样是否对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对此我没有把握，但是我下面说的都是真心话。

一、《论语》

第一本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论语》的版本很多，不需要我介绍）。每个人都应有个做人的道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不修养道德，不研习学问，听到合乎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自己有了错误而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我认为，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修德进学”应是最要紧的。孔子认为，“死生”和“富贵”不应是他追求的目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和学问才是他追求的目标。一部《论语》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学什么？学如何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学做人，在

孔子看就是实现“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做到爱别人并不容易，这要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这样就得有一种“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我想，达到这种境界是极不容易的，只能以此自勉，“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二、《庄子》

第二本是庄周的《庄子》（《庄子》的版本也很多，也不需我来介绍）。我特别喜欢读《庄子》书的第一篇《逍遥游》。对“逍遥游”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也许庄子以“无待”为“逍遥”，注《庄子》的郭象以“适性”为“逍遥”，而我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为“逍遥”。“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无论哲学、文学、科技等等，就失去了创造的动力。如何得到这种创造的自

由？庄子认为，必须抛弃那些对自己身心内外的种种束缚，使自己能“自由思考”，“自由发挥”创造力，这样就必须要有“无我”（或者说“忘我”）的精神。人之所以常常陷入自缚之困境而不能自拔，就在于对“小我”的执着，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择手段地争夺个人权力和金钱，为私利所缠身。这样在精神上还能得到自由吗？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哪还会有为人类作出真正贡献的创造力呢？照我看，人甚至也不应刻意追求什么“名利”之类，为自己树碑立传更近于无聊，这些都是对“小我”有所执着。也许还是凭良心，按道理，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好些。自己创造性地、老实地、扎扎实实地做人、做事为好，努力摆脱“小我”，进入“无我”的境界。使自己升华到“逍遥游”的境地，这样也许创造力就会像无穷无尽的泉水一样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与“大我”融为一体了。

三、《陶渊明集》

第三本书是《陶渊明集》（《陶渊明集》的版本同样很多，也不必介绍了）。你真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我不能。你真能“归园田居”吗？我不能。你真能做个北窗下卧的“羲皇上人”吗？我不能。但我能读《陶渊明集》，

我爱读《陶渊明集》，我能从中得到启示，得到愉悦，得到解放，得到升华，得到自由自在。陶渊明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形影神赠答诗》，而其中我最喜爱的是最后那几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在天地之间，你不要天天为你自己的事忧心忡忡，怕这怕那。海那么阔，天那么空；你应尽的责任，你就自然而然地尽伦尽职吧，不要老去计较你可以得到多少回报！如果这样活着，不是更好、更美、更真实吗？人活着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些损人利己的“争名夺利”吗？我们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每天讲那些看起来“高尚”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真正相信的空话大话吗？难道就是为了说一套做一套，来骗人吗？我们还是像陶渊明那样真实一点好。

四、《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四本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我是50年代初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表现出的对人类的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日我每每想到或读到它心情都非常激动，又非常沉重。伏契克于1943年在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了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它中间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

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时就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姐（引者按：古丝姐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我每次读到这里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

五、《生死》

第五本书是我和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艾克沙维·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合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在法国出版的书名为La Mort, Desclée de Brouwer, 1999）。我无意吹捧自己的书，既然是要我写“我最喜爱的书”，那我真的喜爱《生死》这本书，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伟大等等。我深感当前人类社会（当然包括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多，存在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精神空虚和种种虚伪奸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大概人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大概是和人们对“生死”、“苦乐”的看法不无关系吧！有许多人活着只想毫不付出地享受，甚至害国害民地夺取。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追求“长生”之类而巧取豪夺，过着腐朽的生活，这样活着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样是最大的快乐，最不痛苦的生活。他们的追求和企望与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真正的圣贤的格调相差多远呀！我在《生死》一书中的“超越生死观念和途径”一节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儒、道、释的真圣贤与上面说到的那些全然堕落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苦乐观、生死观，我以为：儒家的苦乐观、生死观是“道德超越”，天人

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实现）；道家的是“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在当今之世，我们没有必要做儒、道、释的圣徒，但我们都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应有为爱人类而生、爱人类而死的生死观。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

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2000年12月26日

作者：汤一介

来源：《汤一介集》

刘小枫：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

我喜欢买卖旧书，这与我的学术经历和兴趣的转变有关。

先说卖旧书，迄今，我已两次大规模“摆摊”卖旧书，都是在大学校园里。第一次在1981年，我就读大学三年级。一个春日的午间，我在宿舍门口摆上几条桌子，摊开一大堆文学理论、电影理论和哲学书籍叫卖，当面议价。一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卖出九成。第二次在1983年，我就读研究生二年级。记得是一个初夏的午间，在北大三角地一隅就地铺开几张报纸，推出一批心理学、美学书籍叫卖。这一次不那么门庭若市，

但前来翻捡的人还算络绎不绝，销量不错。

卖的旧书，大都是自己曾经周折才得到的学术书籍。一些朋友问过，为什么要卖掉？

卖旧书是我的自我调整：卖旧书真正卖掉的是我过去的读书兴趣，算是对自己思想的自我清场。第一次卖旧书表明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再有兴趣；第二次卖旧书则是对心理学和美学不再有兴趣。当然，卖的旧书中也包括一些就学科而言虽有兴趣，但写得实在糟糕的书，这说明自己分辨学术虚实的能力有长进。我喜欢书，但没有藏书癖，

对无用的书扔之后快。不仅书，连自己的文章也扔之后快。1983年曾写过一篇分析电影《见习律师》的时间结构的文章，钟惦棐先生颇称赞，但当时因兴趣转向，便扔进了垃圾堆。

我求学的时代正值70年代中，十余年来，没有什么先师指点，书是唯一的老师。可是，这位唯一的老师也有缺陷：那个时代提供的书是受限制的；要找到能指点自己的热情的书的条件，也是受限制的。如果我要恰切地把握住自己的思考兴趣和问题困惑的真实要点，就必须不断地检审自己的思路。我觉得，这是偶然的时代境遇给予我的馈赠。我羡慕现在读书人的条件，至少不至于像我那样被迫去卖旧书。

再说买旧书。少年时代我就喜欢在旧书店泡，时常会因遇上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而惊喜。遗憾的是，如今旧书店在国内日趋消亡，有的也是名存实亡。最愉快的买旧书的经验是在国外。在巴塞爾留学时，周末逛旧书店是最惬意的闲荡。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巴塞爾市，城里的旧书店有十几家；周末的跳蚤市场也常有学术书的“跳蚤”。例如，我曾碰上特拉克尔诗文书信全编，基督教社会主义文集和表现主义音乐研究（三卷）之类求之不得的旧书，价格极便宜。爱

拉斯莫当年过世时的楼房，现为以他命名的旧书店，是巴塞爾最大的一家，在那里我买到过极便宜的布洛赫全集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百科全书（十二卷）。神学系旁边有一家旧书店是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志愿军的哲学博士开的，他很懂什么是好书，而且不让价。我总是乘他不在，找老板娘以廉价买书。舍勒全集中的几部和梅烈日柯夫斯基的大部头就是这样弄到手的。

买旧书并不只是因为价廉，更是为了拾回被历史和时髦遗忘的思想和学问方向。就学术思想而言，时髦的并不一定是值得深究的，如果我有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的话。

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一百余年来，汉语学术思想界引入了形形色色的外籍学术思想，它们大多因为在国外时髦而被引介。可是，国外学术界的时髦理论也有遗忘真切问题的情形；更何况，我的问题意识很可能与种种主流论述并不相关。问题意识的

交往必须是超逾时代和地域的，逛旧书店就是我的这种超逾行动。

一百余年来，汉语学术思想界不仅引介了大量国外学术思想，也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图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中刘小枫老师所著《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辩证》

在旧书店，我依自己关注的问题去寻找“同道”。我时常感叹：在并不平静、富裕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仍然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少的学者撰述过一些思想深堪的书。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的积累。我热衷于买旧书，不过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寻访历史中思虑的个体和他们的问题。

不少学人都喜欢卖旧书，买旧书则少见。买旧书的嗜好，是我的学术经历和旨趣形成的私人化行为，除了说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说明更多的东西。我述说这一经历，也只是为我从文艺学、美学、心理学转向哲学、神学、社会理论和语文学的个人学历，提供一个简要的注脚，尽管我现在已不再卖旧书（因为已有图书馆或私人朋友可送），并且还在买旧书。这表明，我的学术思想还在不断依新的问题意识去找寻历史中的思想残片。

编辑：丁香的耳朵

来源：《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好文共赏

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一个人的百年史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曾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等。

1月14日，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周先生一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他为人清正、淡泊名利，令世人敬仰，而他参与设计的汉语拼音也将继续造福亿万国人。

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干才的

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牛棚”、下“干校”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 bpmf 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

我读过周先生的这类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地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人人能懂。这是高手文章，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是识见超人、智力优越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丝多。特别是得知老先生百岁之后仍然可以每月写一篇这样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的文章，粉丝更其惊喜感佩。

人出名了，轶闻逸事也多。人们发现，哦，原来，周有光与作家沈从文是连襟，娶的是美丽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羨煞。

而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有光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今年某日，我随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绍寒暄后，周先生开口说，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还没来得及看报，还不知此事呢。当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灵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小友”，她退休前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作协同事、好友，后来与张允和、周有光也熟识起来。金玉良性情温良，为人谦和，特有老人缘，几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来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前瞻的思维和儒雅的谈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来，不论酷暑严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过往年代。她记下来，如今竟成一本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老先生亲自题写了书名，大有“御笔钦定”的意思，又可作“防伪标识”，总之是很满意这本书的。

以往金玉良建议老先生写自传，老先生都谦虚说：“我没什么可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读完金玉良写的这本书会由衷感叹：哪里简单？！周先生今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终归是他百年人生不断历练、修为的结果。即如健康长寿这件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DNA、家庭的影响，于人世间走自己的人生路，起点有多高，作为有多大，天地有多宽，眼界与胸襟、坎坷与通达……无不相关，又怎是单单问个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就以为得了健康长寿秘诀那么简单？

金玉良在前言中虽谦虚地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有光传记，她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但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面貌，就像怀旧的老电影，浮现眼前，带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带着生动的悲欢。

闲来读书，不会去读“中国抗战时期经济史”这样专业图书，但闲读周有光这本书，却能了解到许多当时经济情况。比如，周先生回忆中讲到农本局，我问过学经济的人，也不甚了了。据周先生解释，农本局就是特种农业银行，其资本来源，一半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额的比例摊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政府加强农本局的领导。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受蒋介石委派，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一位协理负责与金融界的沟通和协调等有关事务；另一位协理蔡承新负责农本局的日常业务。农本局的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促进农产品运销。

周有光先生 2016 年 3 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65 周年题词

当时，由于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几乎达不到温饱，更谈不上积存。在耕种季、收获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主要从高利贷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贷。上世纪 30 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银号（即钱庄）和当铺这样中国传统的信贷机构，但是钱庄通常设在城市、商埠，农民无法利用。当铺的情况比钱庄好些，在农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当铺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实际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较短。典当者在期限内如果无力赎回自己的物品，当铺便将其卖掉并从中牟利。虽然如此，当铺规定的条件还是比从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们几乎没有可典当的财物。农民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新的基层借贷机构。

在何廉领导下农本局适时地在后方广大农村，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即合作金库）；又因陋就简，尽量利用已有的公共财产，如乡村的祠堂、关帝庙或观音庙、集镇的会馆来筹建农业仓库。有了农业仓库，农民把收获的物产储存在那里，就不用担心霉烂、损坏。同时，农民如果需要现金，可以用储物作为抵押从仓库借款。农民从合作

金库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也不用物品担保；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本县合作社社员。因为合作社连带有集体责任，合作金库借出的钱款不必担心不能归还。

农本局相继在四川重庆、湖南长沙、陕西西安、贵州、广西桂林、湖北西部设立专员办事处。蔡承新是一同参加救国会的老朋友，周有光经他介绍，在重庆专员办事处主持日常工作。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时间里，重庆专员办事处先后在三十多个县，成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周先生到省内一个又一个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巡回指导、审查；还尝试办家畜保险业务；为了改良柑橘品种，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教授到江津、綦江等处调查。他跑遍四川各地，对那里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

他说刚到四川住在旅店里，他拿两块钱请茶房代买柑橘。一会儿，茶房背回一大背篓上好柑橘。他惊讶，怎么买这么多？茶房说，两块钱就是这么多。事后他才知道，橘农没有储存条件又无法外销，柑橘大量上市时根本卖不上价钱。农业仓库建成后，农本局仿照北方夏天窖冰的方法，向橘农推广如何把柑橘储存在仓库里。柑橘储藏问题解决了，橘农的收入也提高了。

到处奔波，还要随时跑警报，躲空袭。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实施震惊中外的狂轰滥炸。山城变成火和血的海洋，5000多人被炸死，房子大部分烧光了，以至于站在市中心就看到长江和嘉陵江边了，20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周先生回忆5月4日傍晚，他们听到空袭警报赶快把日常公文收拾就绪搬入地下室。喘息未定，离办事处不足二三十米的地方突落数弹，门窗全毁。东边的兴隆街首先起火，接着西边被炸的地方也烟火大作。形势危急，他们当机立断只留两三人看守办事处，其他人携带账册连夜绕道送总局寄存。不久，周先生带着他的办事处迁往长江上游宜宾。

周先生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他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那是他平生坐过的交通工具中最有趣的。飞机翅膀居然是绸子做的，有两只船形的木头脚可以停在水上。当时长江、嘉陵江沿途都有水上小飞机，主要是邮政部门投递信件用的。飞机上有一名驾驶员、一名助手。后部放东西的边上，还可以坐一两个人，他们常常把这座位售出赚点“外

快”。飞机停稳后，小船划到飞机旁边，接送信件或人员。飞机很小，飞得很低，水中的鱼呀、草呀，看得清清楚楚。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奇迹发生了，张允和痊愈了。

周先生在农本局的工作是出色的。何廉曾在文章里写道：“在四川省会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周有光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

回顾农本局岁月，周先生说：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政府每一个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钱的，而钱哪里来呢？追本寻源主要从农民身上来的。只有农本局把钱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所以农本局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

抗战期间，周先生还做了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新华银行等四家银行组织“西北经济调查团”，调查陕西、甘肃的经

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调查团由五位银行家组成，周有光是该团负责人。调查团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走到嘉峪关、玉门、安西。

每到一地，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府衙，结果令人遗憾，官员们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茫然无知，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调查团有人想到了教会，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况。周先生说：“噢，不得了！他们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调查团在西北获取的最有用的资料，几乎都来自教会。

周先生说，西北的教会主要是西罗马系统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传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学毕业。到了中国他们要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学习国语，还要学习当地方言。他们要深入边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会定时向罗马教廷报告。所以，说他们是特务也不冤枉。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教使信徒觉醒，跟了他们走向天国。传教士到一个地方，给有病的人治病，教没有文化的人识字读《圣经》，还教生活技能。今天要发展西部，

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调查结束，别人都回重庆，周先生兴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黄沙漫天，男人要随时下车铲沙子。途中，一位用纱巾蒙着头和脸的摩登女郎带着孩子搭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原来是常书鸿夫人，去探望正在那里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画家张大千和考古学家向达也在那里——他们每个人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抗战时期，周有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不仅吃苦，而且承受国破人离散的惨剧。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 36 次，可爱的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一日在外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周先生夫妇心中，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供职的新华银行，派他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周先生眼界更开阔了，人也阔了。在美国感受四通八达的铁路，高档车厢里还有浴室；去英国乘豪华游轮，有游泳池，晚宴都要穿礼服，张允和单是旗袍就带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颇为风趣地对金玉良说：“那时我有那经济条件。不像你认识我时，都穷趴地了。”

一时赴觥筹交错的华宴，一时过“凭票供应”的日子；65 岁于“干校”挑担插秧，98 岁在北戴河下海游泳……穷过富过，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也坎坷失意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百年史，您以为老寿星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郭娟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史苑钩沉

李零：历史就在你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

恭喜各位，欢迎各位。我很羡慕你们，你们都是北京大学的 students 了。我是北大老师，但没当过北大学生。我是从中国社科院逃出来的难民。1985年，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调我，我才落脚于此。我们古文献的领导，已故的倪其心老师，他有很多经验之谈。有一回，他跟我说，在北大立足，得三条过硬：一是出身过硬，北大毕业；二是师门过硬，老师是北大名师；三是学术过硬，没真本事也不行。鲁菜有一道名菜，叫三不沾。第一条，我肯定不沾，不像你们，名正言顺，有“贵族出身”。第二条，我的老师张政烺，虽然是很多北大老师的老师，在学术界很有名，但不知为什么，1960年被北大解聘。看来我只能在第三条上下工夫，不然就是三不沾。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晚上有个撞钟仪式。北大名人季羨林、王选，还有一个女同学，仨人一起撞钟。电视画面，季老站在前面，王总站在中间，后面那个女生，黑咕隆咚看不清。她的名

字，发音跟我有点像。第二天，有人打电话，祝贺你呀，想不到你在北大这么牛，居然跟季老一块撞钟。我说哪儿的事，昨天一整天，我一直在家看电视，白天看陈平原老师讲校史，晚上看你说的撞钟。他说行了，你就甭谦虚了。其实，那天是北大校友返校聚会的日子，我根本没资格参加。

北大校庆，活动很隆重。咱们学校编过一部校史，很厚。我粗粗翻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邹鲁风。校史馆，我从来没去过，对校史一点也不熟。可是今天我忽发奇想，很想跟同学们聊聊我挣钱吃饭的这个单位，从一个外来户的角度讲讲北大校史，浮光掠影，粗枝大叶，讲到哪儿算哪儿。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教育史和学术史，不知怎么弄的，全都成了大师史。大师什么劲头，据说“特有风骨”，飘飘然，超乎社会、政治之外。现在有个说法，叫“民国范儿”。“范儿”是北京话。“民国范儿”是“民国粉儿”怀念的做派。陈

丹青尊鲁，有人说他就是“当代鲁迅”。他把鲁迅也归入“民国范儿”。但鲁迅对民国可没什么好词。“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赠邬其山》），他看见的“中华”是什么样？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人说，1927—1937 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鲁迅这诗写于 1931 年，正好赶上这一段。他眼拙，楞没瞧出它的灿烂辉煌。

大师是什么人？我理解，那是大乱的产物。国家大乱，学术大乱，教育大乱，一切推倒重来，每次重建都有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这些人就是大师。大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但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他们说了，大师都是 1949 年以前的主儿，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或去了美国，反正跟革命无关，跟老百姓无关，跟共产党无关，特别是跟新中国无关。比如讲学术史，当然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讲教育史，当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校长罗家伦、梅贻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这样腾云驾雾讲历史，老实讲，不仅难得其全，也难得其真。

清朝有一种《太狮少狮图》，不知大家看见过没有，大狮子旁边有小狮子。有一回在福建开会，某人说，现在为什

么没有大师？其实不是没有大师，比如我身边这位，他就是大师，关键是咱们不团结，不像人家影视圈，互相提携。我理解，他说的“提携”就是炒作和吹捧。所以晚上，他们开始选大师。大师和小师有不解之缘，关键全在一个吹字。有人喜欢吹，有人喜欢被吹。爱吹大师的人多半是摩拳擦掌准备当大师的人。小师吹大师，才能当大师。甚至有人说，看谁活得长，谁长谁是大师。

现在的“大师”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装神弄鬼的人（如气功大师、风水大师），一个意思是尊孔复古的人。后者一定要在“大师”前面挂上“国学”二字，“西学”好像无“大师”。比如季羨林，明明研究南亚史，他们非得叫“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不承认，那也不行。他们说，那是大师太谦虚，不承认怎么啦，照样可以强制执行。

我是学考古的。考古，不是挖死人，就是挖死人的东西。搞考古的最清楚，历史就在你的脚下。《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活人变死鬼，那是早晚的事。历史都是鬼影幢幢。杜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大概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鬼影。我在这儿讲的话，自然也就

成了鬼话。

下面分五个问题谈。

（一）北大景观

言归正传，现在讲北大。我先讲视觉中的北大，咱们拿眼睛可以看到的北大。看看它是坐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不是风水大师，但不妨给北大望望气。

北大校史，一百多年，在中国属一属二，但搁欧洲，嫩得很。前几天，我刚去过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六百多年。

欧美大学什么样？一种像庙，一种什么都不像。很多没校园。有，也没围墙。有些干脆就在市镇上，这条街上有个楼，那条街上有个屋，不加指点，根本看不出来。

北大，现在的校园是燕大校园。老北大在城里，现在是古迹。沙滩红楼，过去是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我经常去，现在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在的北大包括燕大。比如侯仁之先生就是燕大的老师。我说的景观是新北大，不是老北大。

我是在北京长大。一进城，先住先农坛，后搬拈花寺、东四六条、铁一号，上学在白米斜街，挨着什刹海。反右运动之后，我家才搬到西郊。

北京，长城打北边过，历史上是个边塞。它东有承德、山海关，连着东三省，西有张家口、大同，连着内蒙古。北方民族南下，把它变成首都。皇城根下，大有胡气。小时候，城里还走骆驼，西郊还有狼。我这辈子，只有10岁以前住城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淀附近度过。海淀这一带有很多湖。海淀的意思就是这些湖。当时，我们不太说“海淀”，要说“海淀”，也不是海淀区，而是海淀镇。我们常把这一带叫“西郊”。

海淀镇，原先是区政府所在，现在区政府搬地方了。这一带有什么文物古迹，大家可以看侯仁之先生的书，看《北京文物地图集》，看海淀博物馆。咱们这一带，有山有水，被皇上看中，是个盖花园的好地方。清代有所谓三山五园，三山是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这三山下面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还有它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每个园里又有很多园。燕园是北大校园，园中有园，园外有园。它东边是清华园，西边是畅春园（属于北大），北边是圆明园，南边是海淀镇。燕京八景，有三个景（蓊门烟树、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在西郊。我记得，香山植物园（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朱德送的一屋子兰花，溥仪特赦后，就在那

儿上班。

小时候，从城里去颐和园，去香山，要出西直门。一出西直门，满目苍凉，旷野中立着带龟趺的大碑。沿途，窝头状是老百姓的坟，苍松翠柏围着，是太监的坟。海淀博物馆里的金银珠宝，很多都是从太监墓里挖出来的。中关村，早先叫中官坟，中官就是太监。

西郊这一带，墓地文化特别发达。如梁启超墓在卧佛寺，齐白石墓在魏公村，李大钊墓在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名人最多。王国维自沉，雇人力车，出清华西门，奔颐和园，淹死在鱼藻轩，纪念碑在清华，墓在福田公墓。李云鹤（江青）的墓也在福田。我老师的墓就在它前面。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墓在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墓在正福寺。

1949年后，这一带是大学区，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还有八大学院，全在这一带。科学院、军科院，也在这一带。1958—1963年，我住人大林园2号楼（后改6号楼），1964—1980年，我住中关村北区10号楼，都在北大附近。中关村北区10号楼，楼上楼下都是著名科学家。这片灰楼，现在破破烂烂，不起眼，但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中研院的第一届院士，包括两弹一

星的功臣，原来都住这个院。钱三强、何泽慧住14号楼，两口子一直住14号楼，到死都没离开。军科院也是名将所聚。粟裕，百战名将，遭贬黜，在军科院当副院长。彭德怀下台，住吴家花园，就在北大西边。

“文革”，外地造反派是学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是学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是圆明园。清华附中的一帮孩子在那儿聚会，才有了红卫兵运动。北大附中的老兵不叫“红卫兵”，叫“红旗”，资格同样老。假如毛泽东不是写信写给清华附中，而是写给北大附中，那“红卫兵运动”肯定就是“红旗运动”。

我第一次进北大是1966年。我去干什么？看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看完，从三角地转到未名湖，眼前刷地一亮。哎呀，天下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校园。我记得，“中央文革”在大操场讲话，灯光惨白。江青哭诉他们家的矛盾。陈伯达说，我的中国话讲不好，请王力同志翻译。这以后，我经常来这儿看大字报。有一首诗，我还记得，题目是《过关》，“万年太久争朝夕，朝夕有时抵万年。子胥过关须发白，白了须发未过关”，不知何人所作，就是

抄在大字报上。当时，高校武斗，全是原始武器，北航发过枪，刚发就收回去了。我记得，北大南墙那排楼，墙被打穿。清华、北大架高音喇叭，深更半夜，突然放哀乐，瘆得慌。

我来北大，突出印象是改革开放，一幕一幕，历历在目。我还记得，知识分子哭穷，推倒南墙办商店。哲学系有三个老师办了风入松。后来，中关村成了电子一条街，成了“知本家”的天下。现在，风入松关张，南墙被恢复，知识分子已脱贫致富，课题制的大潮席卷一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潘阆《逍遥词》）。墙外是红尘滚滚，墙内也是红尘滚滚。原来的北大什么样，大家已经忘了。难怪有人说，魂兮归来。

（二）北大是个革命家的摇篮

北大最有名，莫过闹学潮。

北大建校百年，百年主要在 20 世纪的范围里。这 100 年里，地球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引发两次革命。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北大发生过三大运动，全跟这个主题有关。离开这个主题讲历史，你什么史也讲不清。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1915—1917 年）。

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但不是一般的文化运动，而是弃旧图新的运动。为什么要弃旧图新？因为有世界性的大危机。它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 7 月—1918 年 11 月）。这场战争肮脏透顶。如果不是“民主国家”窝里斗，哪有俄国革命（1917 年 11 月 7 日）？没有俄国革命，哪有中国革命？

20 世纪的风云人物是应运而生，时机很重要。他们多是世纪之交的人，早一点儿是 19 世纪的“80 后”“90 后”，晚一点是 20 世纪的“00 后”或“10 后”。他们不早不晚，正好赶上这场大危机。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很多是“海龟”，出国取经，不忘父母之邦，不像现在的“海王八”，忘爹忘妈，一去不复返。他们，除蔡元培年纪大（比其他人大十来岁），主要是 19 世纪的“80 后”“90 后”。张政烺先生说，北大教授都很年轻。当时的人，跟现在不一样，结婚早，出名早，死得早，很多人都活不过 50 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到 50 岁，就得考虑后事，人生有如压缩饼干。

1. 蔡元培（1868—1940），前清进士，48 岁当北大校长，是北大最有名的老校长。他是老同盟会，属于革命党，

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杀共产党，他跟老蒋站一边，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拥护国共合作，又跟宋庆龄、鲁迅是一伙，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至今为人称道，但蒋介石最恨这四个字，恨他坐大了共产党。他对这位老同志十分痛恨，骂他一生“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蒋氏日记，1940年3月7日）。其实，蒋氏所恨，正是其光荣伟大之处。

2. 陈独秀（1879—1942），38岁当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书记，但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中共领导人，全被国民党杀掉。

3. 李大钊（1889—1927），31岁当北大教授，从照片看，好像年纪很大，其实他只活了38岁。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由他发起。当年，张作霖杀李大钊，没钱下葬，很多北大教授捐了款，就连国民党的老左派汪精卫都捐了1000元。

4. 鲁迅（1881—1936），曾兼课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他呕尽平生血，大骂中国人。中国人骂中国人，日本人爱听，对他推崇备至，但他的话，

不是骂给日本人听，而是骂给中国人听。他死后，沈钧儒写了个挽幛，反而称他为“民族魂”。鲁迅不是共产党，但对苏俄好奇，跟瞿秋白是莫逆之交，帮过很多共产党人。他翻过《毁灭》。曹靖华翻《铁流》《第四十一个》，他参与过编校。他对革命，不光同情，而且理解，对它的正反两面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很清楚，革命不是跟“君子”闹革命，而是跟“小人”闹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而是沾血带污。他只活了55岁，没能看到抗战和抗战以后的事。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答罗稷南问，罗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一种是“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后说可能是从前说演义，有人考证，已经走样。冯雪峰回忆，鲁迅对周扬整胡风、黄源很反感，当年就敢顶撞共产党的领导，他的骨头确实很硬。

5. 周作人（1885—1967），33岁当北大教授。抗战期间，出任伪职。战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他14年大狱，后来特赦，人是放出来了，但没去台湾。1949年后，共产党对他很宽大，毛泽东批准，让他在家写作，稿费很高，相当

总理、部长级的收入。

6. 钱玄同(1887—1939)，曾兼职北大，只活了52岁。

7. 刘半农(1891—1934)，26岁当北大教授，只活了43岁。

8. 胡适(1891—1962)，26岁当北大教授，54岁当北大校长，他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崇美，反共。反共与蒋介石有共同语言，崇美可不一定。他1949年离开大陆，先去美国，待了很久，后来才被请回台湾。1957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当场遭胡适反驳，原因就在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支持过雷震的《自由中国》。蒋敢抓雷，不敢抓胡，私下骂胡为“狐仙”“蠹贼”(蒋氏日记，1960年10月13日)。胡死，蒋称“暴卒”(蒋氏日记，1962年2月24日)，说是总算“除了障碍”(蒋氏日记，1962年3月3日)。

这八个人，全跟北大有关。他们的共同点只是“新”，后来分道扬镳。第二次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爱国的意思并不复杂，当时叫救亡图存。爱国是救国，又不是打别人。自己的国家要亡了，

怎么就不能救一下？现在有人说，救亡图存挡了启蒙的道，这叫什么话？还有人拿“爱国贼”骂人，简直丧心病狂。美国骂人话，“民族主义”很时髦，那是骂落后国家的落后人，骂他们不该爱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那是家家挂星条旗，爱国爱到发狂。比如美国人连导弹都以“爱国者”命名。他们的反导系统，也叫这个名。“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借口反恐，还立了个“爱国者法案”，明可监听，暗可虐囚。民主投票，到海外打仗，这在美国就叫爱国，谁敢说个不字。

五四健将多是北大在读的学生，比上面那批人，年龄小一轮。上面那批人是老师辈，这批人是学生辈。

1. 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康(见北大档案馆的档案记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7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即后来的中文系)，是咱们中文系最著名的革命家。他是洪湖苏区和红二军团的领导人。王明上台后，对他无情打击，撤消一切党内职务。接替他的叫夏曦，几乎把洪湖苏区的高级将领全部杀光。1933年，邓中夏被捕，国民党说，你为共产党卖命，他们把你整得这么惨，你图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

的事，患深度杨梅疮的人不配嘲笑伤风感冒的人。他死时仅 39 岁。

2. 高君宇（1896—192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 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地质系。他写过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只活了 29 岁，死葬陶然亭，确实如闪电、彗星。

3. 罗章龙（1896—199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8 年入北大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1930 年以“另立中央罪”，被开除出党。“文革”后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

4. 张国焘（1897—1979），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 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哲学门。他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途中搞分裂。1938 年逃离延安，加入军统，最后死在加拿大。

5. 傅斯年（1896—1950），1913 年入北大预科，1916 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他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1928 年创中研院史语所，“史”是以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他是国民党文史之学的组织者和灵魂，咱们中文系出的大学问

家。他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时，中国的考古资源全在国民党手里。1949 年，傅氏随国民党迁台，除任台大校长，还兼史语所所长。杜正胜说的“新史学之路”就是“傅斯年之路”，既别于郭沫若，也别于顾颉刚，跟大陆史学唱对台戏。但 1949 年后，史语所的“史”是“无土栽培”，他们只能炒冷饭，整理大陆带去的老资料，考古资源全在大陆。

6. 罗家伦（1897—1969），1917 年入北大外国文学门（即后来的外文系）。他是《五四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五四运动”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清华大学从教会学校改国立大学，他是第一任校长，后被清华师生赶下台。1949 年，他也去了台湾。还有两个人也和北大有关，毛泽东（1893—1976）和瞿秋白（1899—1935）。毛泽东在红楼当图书馆助理员，不是北大学生。瞿秋白交不起学费，也没上成北大。但咱们北大有蹭课传统。毛泽东和瞿秋白是旁听生。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

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My office was so lowly that people avoided me. One of my tasks was to register the names of people who came to read newspapers, but to most of them I didn't exist as a human being. Among those who came to read I recognized the names of famous leaders of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whom I was intensely interested. I tried to beg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men. They had no time to listen to an assistant librarian speaking Southern dialect.），“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But I wasn't discouraged. 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the classes in the university.）。他只是说，他无缘与他十分景仰的北大名人说话，如此而已，但有一种说法从台湾来：毛泽东为什么

爱整知识分子，全因当年在北大受气——他是挟怨报复。这种因果论，一看就是恶意虚构，想不到在大陆，人云亦云，不胫而走。当时的北大，是他向往崇拜的地方。他到北大是经杨昌济介绍，工作是由李大钊安排。他说，“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And here also I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Yang Kai-hui, whom I was later to marry.），就连老婆都是在北大找的。咱们西校门的匾额就是毛泽东所写，他凭什么要恨北大呢？

1945年，傅斯年去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夸傅是五四名人，有大功。傅谦言，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指在北京闹学潮），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因此，毛泽东写了章碣《焚书坑》相赠，曰“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五四”以来，学生分左右，就是一个家里，有时也分左右。左翼跟文学关系比较大，跟学术关系比较小，很多人都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可能像傅斯年、罗家伦他们，依附国民党，办教育、做学问，这是形势使然。左翼史学，郭沫若是代表，他是被通缉追杀，躲在日本，才有可能治甲骨金文。这样的机会太少。瞿秋白很羨

慕他（见《多余的话》）。这就是“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注脚。

第三次是“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

日本侵华，东北被占，华北危急。这是又一次历史性大危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包括中学生。他们是20世纪的“10后”，“九一八”事变后入学，比五四时期的学生又晚了一轮。

1. 郭明秋（1917—2001），1935年入北平女一中，北平学联主席。1935年加入共产党。

2. 姚依林（1917—1994），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北平学联秘书。1935年加入共产党。

3. 邹鲁风（1908—1959），1933年入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北平学联总纠察。1936年加入共产党。

4. 黄敬（1912—1958），1935年入北大数学系，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1932年加入共产党。

5. 孙敬文（1916—1998），1934年入私立镜湖中学，北平学联总交通。1935年加入共产党。

6. 韩天石（1914—2010），1933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主席。1936

年加入共产党。

7. 葛佩琦（1911—1993），1933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共产党。

8. 邓力群（1915—），1936年入北大经济系。1936年加入共产党。

9. 蒋南翔（1913—1988），1932年入清华中文系。1933年加入共产党。

10. 周小舟（1912—1966），1931年入北师大国文系。1935年加入共产党。这回，蒋介石说对了，上述学生领袖，运动前后，或早或晚，全都加入共产党。他们不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还参加了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蒋败走台湾，痛定思痛，只恨杀人太少，后悔药一直吃到“五四”。其实，这才是挟怨报复。

（三）革命者的下场往往很惨

1949年后，海淀有三所大学最有名：人大、北大、清华。北大偏文理，清华偏工科，是老牌大学。人大偏社科，是革命大学。我是人大院里长大。人大地位很高，正校长是吴老吴玉章。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延安五老之一。它的副校长，胡锡奎6级，聂真（聂元梓的哥哥）6级，邹鲁风7级，资格都很老。但人大建在荒地上，荒草萋萋，坟头林立。胡锡奎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

住林园1号楼。只有他在楼下安了个锅炉，有热水通家里。这是唯一的特殊化。郭影秋从南大调来，一定要住平房（当时和现在不一样，是以楼房为贵）。他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文革”前，人大一直不盖楼，跟北大校园没法比。

1957年，许孟雄骂人大，说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人大整过很多人，问题确实严重，陶铸说是“老大难”，一点儿没错。现在有个说法，人大是“第二党校”“马列主义神学院”，语含讥讽，意思是这个学校很僵化。但人大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整人的人，就有挨整的人，也有为这些人打抱不平，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人。比如胡锡奎，就是整人的人；人大出过三大“右派”：葛佩琦、许孟雄、林希翎，还有邹鲁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是挨整的人；我父亲就是为蒙冤者打抱不平的人。人大、北大、清华都是共产党领导，说好说坏，问题连一块儿。更何况有些人大人本来就是北大人。

其实，人大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不是讲人大校史的地方。人大的已故前辈，我只举三位，他们都和北大有关。

1. 尚钺（1902—1982），北大学生。1921年进北大，先入预科，后入英语系。他在北大期间，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

史略》。1925—1927年，他与鲁迅频繁通信，成为鲁迅的追随者。他先入莽原社，后入狂飙社，写过《斧背》《病》《预谋》等小说，是狂飙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年9月，全国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他反而加入共产党，回家乡组织秋收暴动，两度被捕，受尽酷刑。

1929年，他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地下工作，很多后来的抗日志士都出自他的门下。金日成是他的学生。1932年，因路线斗争，他被开除出党，妻子陈幼清在鄂豫皖苏区被杀害。但他不改初衷，仍然从事革命工作，直到1945年，才重新入党（历史问题并未解决，仍然留下尾巴）。1949年后，他在人大讲中国通史，在古史分期的问题上，持魏晋封建论，和我老师一样，属于被中央禁止的一派，历次运动都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妻子阮季在“文革”中自杀。他女儿尚晓媛跟我说，他对鲁迅感情很深，当年与鲁迅有冲突，晚年很后悔。1930年，有一天，他在上海大街上偶然看见鲁迅，这是最后一面。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命运对他很不公。

2. 邹鲁风，上面提到，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曾名邹素寒，东北辽阳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迁北平，他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

生。他曾通过鲁迅，找党组织，跟鲁迅借过钱。鲁迅日记提到他，是叫陈蛻（地下工作的化名）。他是仰慕鲁迅，才改名邹鲁风。1959年，有个著名的“两校调查团事件”。两校是人大、北大。调查团是奉北京市委之命，调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邹鲁风是团长，张腾霄是副团长。出发前，两校领导（胡锡奎和陆平）曾亲自送行，但庐山会议，毛泽东和彭德怀吵起来，反左改反右，邹被北京市委和人大、北大抛出，当替罪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处分是调到北大当副校长。他是在北大任上自杀。他的死，说法很乱，有人说他是在未名湖自沉，不对。谢冕、孙玉石、洪子诚有个对谈，孙老师说他是在燕南园66号上吊，也不对。其实，他是在我家前面那个楼服安眠药自杀。小时候，死人的事很少听到，熟人死，更是几乎没有。他儿子是我的同学。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

3. 葛佩琦，上面提到，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人大出过三个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我都认识。葛佩琦，表面是国民党少将，其实是共产党卧底，熊向晖式的人物。1949年后，他在人大当物理讲师，失去组织关系，找不到证明人。1957年，他给胡锡奎提意见，要

求恢复党籍。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我也做过，像你这样脱离群众，是要掉脑袋的。此话几经篡改，变成他要杀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过去，每次办阶级斗争展览，都要把他搬出来，说明反右很有必要。他蹲了18年大狱，老婆离婚，孩子改姓。出狱后，眼睛都瞎了。许孟雄跟他不一样，他是清华大学英语系毕业，既当过国民党外交官，也跟周恩来一起工作过。他英语极好，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子夜》和《暴风骤雨》。1957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后悔跟了共产党，信还未出校园，就被查扣，因此下大狱，关了14年。林希翎是风华正茂的在读生。她参加过解放军，吴老非常喜欢她，只因个性强烈，说话太冲，也关了15年。这三个人，第一个平反是谁？你猜猜看，反而是国民党背景的许孟雄。葛佩琦，瞎着眼睛跑，跑了3年，到处吃闭门羹，好在最后平反了。林希翎则含冤抱恨，到死都没平反。林希翎到台湾，照样大骂国民党；到欧洲，照样反对科索沃战争。这是哪门子右派？

上面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者是殉道者，下场往往很惨。你要投身革命，就要准备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升官发

财，想都不要想，好处一点没有。毛泽东说“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主要就是讲被自己人杀，自己人整。

读《动物农场》，有一点很清楚，革命和围剿有不解之缘。穷人，本来就穷，围剿就更穷。自己人整自己人，也和被围有关。革命是群众运动，得于群众运动，失于群众运动。和平环境下，一个单位里都妇姑勃谿，更何况战争环境乎！

整人的原因是什么，要从历史环境探讨。内因和外因都值得探讨。

楚围宋，华元有言：“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残忍，然而其过在楚不在宋。我们要知道，即使冷战也是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思想渗透，弱势被强势包围，没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句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四）也说“民国范儿”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

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

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東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

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

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莘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对这段历史有他自己的描述，大家可以找来看。

他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

《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暴民造反”等于共产党斗地主资本家，迫害知识分子。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集》，经他索隐，陈诗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那阵儿，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他说的机会是什么，你们猜猜看。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

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出长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

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张先生，说说他和前两位有什么不同。

（五）张光直先生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在北平长大。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同，不是全面向右转，而是全面向左转。世界上的大学者、大文豪和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他生活在北平，受时代风潮影响，思想左倾，同情革命，再正常不过。他大哥张光正（何标）和同学温景昆（南开教授温公颐之子）对他影响最大。1945年，张光正去晋察冀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员。

张光直是1946年12月31日随父母去台湾，当时才15岁。他到台湾不久，1947年2月28日，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让他碰上了。台湾人反对国民党，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忆过那一天，远处传来枪声，他的外

省籍同学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着，有一天，“有一个国文老师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扮演了没想到的角色”，这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生从事革命的白族诗人罗刚（罗铁鹰）罗老师（1917—1985）。

1948年，在罗老师鼓励下，他写过7篇小文章，登在台湾的《新生报》上，如《文学是为多数不幸者存在》，一看题目，就是左倾。他把罗老师的讲授，把他对劳动者的同情写进《伐檀》。他不满学校中的“麻木”和“暮气沉沉”，反对“孤立台湾，割断与大陆的一般性和联络”。他怀念北平，怀念那“粗线条的北国”（“我感谢它——我的故乡，它孕育了我北国的特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黄色的土”。他盼望那远方的来信，每次读信，都双手颤抖，热泪滚滚。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北平。当时，台湾的民主运动与大陆的民主运动是此呼彼应，国民党风声鹤唳。蒋介石第一次尝到他的对手曾经尝到的滋味，被人围剿的滋味。4月6日，国民党到台大抓左翼学生，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学生相信，名单是由他们的校长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学生，也在被抓之列。获罪

原因恰好是“北国来信”，他与温景昆的通信。他被国民党抓起来，蹲了一年大狱。50年后，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总算写出来。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书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不仅记载了同狱的21个“匪嫌”，还见到过金门海战（台湾叫“古宁头大捷”）的“共军俘虏”。他提到的“刘团长”（刘天祥），大陆一直不知下落。这个“死亦为鬼雄”的铮铮铁汉，就是靠了他的笔，才留下最后的身影。狱中的“好人”让他刻骨铭心。

出狱后，1950年，他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他说他之所以考这个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1955年，带着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国。李济盼他学成回台湾，他却选择留美国。罗泰说，这一选择不知是不是与他的牢狱之灾有关。李光谟则推测，也许是为了日后与大陆合作。

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是1975年5月，离开北京已经29年。他是随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华，既是为了学术交流，也是为了看望故人，更大愿望是看望故人。这以后，他多次回北京。1980年，他终于见到他大哥。1982和1983年，他在《秋水》杂志（波士顿地区的华文杂志）上写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是写他

回大陆看故人。

《杨老师》是写他在台北建国中学上高中时的老师，原型是上面提到的罗老师。罗老师回大陆，曾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后回云南。肃反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打成右派，他在台湾的革命经历换来的是“敌特嫌疑”，“文革”遭罪，老婆离婚，跳楼自杀，摔成残废。

《孙在芳》是写他的小学同学。这所小学是日本人办的。“孙在芳”的原型是《番薯人的故事》提到的管彤芬，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她爸爸任伪职，被同学耻笑，她说，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和我弟弟是不是跟小日本好。后来她参加了共产党，专门负责送情报，大冬天里，天天在冰水中渡河，落下一身病。1949年后，她爸爸被枪毙，弟弟自杀。“孙在芳”临死前，“我”去看她。病榻上的她，骨瘦如柴，面带微笑，一点不怕死。

《王恢与李继禹》是写他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初中时的同学。书中的“我”和“老张”是台湾人，后来去了台湾。

“王恢”和“李继禹”是北京人，后来投身革命。“李继禹”，“文革”被打断双腿，想不到献身革命，反而成了革命对象。有一天，“我”在台湾撞见“王恢”。原来他早就潜入台湾，不幸于“四

六”事件被捕，受尽酷刑，出狱后，靠摆摊算命过日子，下场很惨。“老张”“王恢”和“李继禹”的原型是谁，我不清楚，反正是代表了两种选择，选择革命都倒了霉。

他的3篇小说，主要人物都是台湾说的“共匪”。他本以为，这些人都是革命功臣，现在至少也是“中级以上的干部”，万万想不到，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惨，而且让他更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无怨无悔。张先生笔下的“小人物”说明了什么？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故人，凡是参加革命，凡是留在大陆，凡是跟了共产党，活该倒霉。相反，张先生在美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肯定最幸福。但张先生怎么看呢，你猜猜看。

在小说《杨老师》中，“杨老师”的儿子“杨强”写信给“我”，痛说他爸爸遭受的种种苦难，说他执迷不悟，这一辈子全白活了。“杨强”的原型是罗刚之子罗鸣（已去世）。他说他是学物理的，最近有惊人发现，要“我”帮他在美国发表，没准能得诺贝尔奖，“那时我要向美国的朋友，向全世界的朋友，控诉中国×××的×××暴行”。“我”很悲愤，不知如何作答。最后，他这样说：

照来信说，杨老师自1957年来遭

受了不少磨难，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费了。也许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没有目击他的磨难，却在 30 多年以前与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我说快乐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为我们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斗争着，并且还相信在这个斗争上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而一旦胜利，黑暗便消灭，太阳便上升，天便亮了。杨老师比我还幸福，因为他更进一步地经历了天亮的过程，而我却一直停留在旧社会里面。你的父亲为了理想而奋斗，而且进一步目击了那理想的实现。你可曾想过：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几个人有过这种幸福的经验呢？他这一生显然是没有浪费了的，我们应当替他高兴才是。

在这封信中，他把革命者比作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如果生时虔诚，死后一定能进天堂吗，这个问题自我们无神论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实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问题恐怕便多了。谁能保证死后的审判一定是公正无私的呢？万一我们竟发现人间的黑暗也被带入天堂，而死后面临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这种情形发生，那么虔诚的教徒会作何感想呢？

1948 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们

有目击天亮以后的福气——也可以说是有目击天亮以后的不幸。

最后，他把这样的话留给杨强：

我们这几代的人是最幸运的了，我们这几代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了。我们的幸运是只有我们才有那走“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可是那五千年来的黑暗有强韧的生存力量，不是一瞬间的光华便可以将它消灭的。要走那万丈光芒的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曲折的，我们跌倒的机会也比别人都多。这样说来，你和你的父亲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和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知下去多少代的儿女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的父亲战斗过了，下面要看你的了。在《王恢与李继禹》中，他并不认为，在北京同学的四人中，去了美国的“我”才最幸福。相反，他以自嘲的方式，借别人的口，向自己发问，在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无论为台湾，还是为大陆，你都做了什么？“我”很惭愧，无言以对。

张先生去世后，三联书店编了个纪念集，书名是我起的，叫《四海为家》，编者前言由我代笔（未署名），我把我对他的理解写在这篇前言中。后来，张光正先生打电话，要我把这篇前言当《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的代序，

我答应了他。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张先生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学作品，让我非常感动。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不是当文学读，而是当历史读。它让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执教 28 年的北京大学，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个世纪。

这 100 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宛如昨日。它不仅对我们的父辈是轰轰烈烈，对张先生是魂牵梦绕，对我也是挥

之不去。

记的碎片纷至沓来，有如大树飘零。历史就在你的脚下。

来源:豆瓣

作者: 李零

■ 大美北大

燕园春雪

2月21日,2017年迎来的第一场春雪。



来源：北大新闻网

学员心声

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小时候由于家里条件不好，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高中毕业后我就参加工作了。毕业几年后，我又开始特别羡慕能够上大学的人，怎么办呢？最后开始下定决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让自己的人生不要留下遗憾，为此我开始了艰苦的求学的旅程。我参加了湖南大学会计专业的自学考试，参加了会计资格证考试、会计初级、中级职称考试，我相信只要肯付出就会有收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顺利拿到了专科毕业证，会计证，会计初级职称，会计中级职称。人生到了一个阶段，就想着往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所以就想着把本科也读了。很荣幸，2014年9月通过考试我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成为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4年度秋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

“追求上进、积极进取、争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我努力学习的最朴实的动力。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

留下遗憾，我从进入北大学起就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积极进步，学习上勤奋刻苦，工作上认真负责，生活上勤俭节约。一直为使自己成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而努力拼搏，从各方面去提升自己，锻炼自己，完善自己。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是有矛盾，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在网上学习，看课件，听视频，认真完成老师留下的作业，十分珍惜每次答疑的机会，认真和老师沟通学习上的问题。同时利用课程论坛与老师沟通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做到多归纳多总结，认真对待每次期末考试。我的付出没有白费，大部分考试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学们都来取经，为此，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学习兴趣小组，把平时好的学习的方法和经验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和大家一起进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北大的学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老师不会因为网络教育而降低要求，考试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不得不卯足了劲的学习，以跟上老师的学习进度，其实只有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才能真正的学到知识。在北大学习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因为通过几年的学习，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认识了许多的朋友，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得到了提升。这就叫做痛并快乐着。

北大的学习对我工作的帮助也非常的大，俗话说“学以致用”，学了知识，然后进行应用，这才算真正学到了知识。北大的学习使我的知识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开阔了眼界，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工作的

思路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同事和领导对我的进步表示非常的惊讶。

我要感谢北大继续教育学院的老师和学习中心的老师，谢谢你们的认真负责和严格要求，没有你们的付出，我就不会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再次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我会以一个北大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来回报社会，为母校争光。

作者：张琼花

深圳学习中心 2014 秋

编辑：丁香的花朵